



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中宣部2020年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出版工程项目

写给★ 青少年的★ 党史★

邵维正 主编

中国有了共产党

刘晓宝 著





献礼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写给青少年的★ 党史

主 编
邵维正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有了共产党 / 邵维正主编.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20.10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

ISBN 978-7-5552-9212-8

I. ①中… II. ①邵… III. ①中国共产党 - 党史 - 青少年读物
IV. ①D2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0) 第087772号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传播
本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书 名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中国有了共产党

丛书主编 邵维正

著 者 刘晓宝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 : //www.qdpub.com](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532-68068091

策划编辑 谢 蔚 梁 唯

项目统筹 刘克东

责任编辑 刘克东 崔 晨

特约编辑 薛 娟

装帧设计 乔 峰 阅优文化

插图优化 乐道视觉

制 版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0年10月第1版 2021年 3 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10mm × 1000mm)

印 张 11.5

字 数 23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9212-8

定 价 38.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050

建议陈列类别: 青少年读物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丛书

编委会

总 顾 问 李 捷 张启华

主 编 邵维正

编 委 刘晓宝 李步前 张艳萍

审 订 黄如军 韩洪洪



邵维正

青少年朋友们好！摆在你们面前的这套党史读本，是几位党史研究专家应青岛出版社约请为你们量身定制的，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记，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

我们这套书就是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为主题，以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主线，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主旨创作出来的新颖、系统、通俗的党史读本。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已走过百年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中共党史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史料浩如烟海，要构建出一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党史读本，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具有开创性的事情。

经过反复构思，这套读本另辟蹊径，尝试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党史讲述新方式来构建整体框架，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突出重点、难点、

热点、亮点，梳理归纳了当代青少年最为关注的 60 个问题，按历史阶段分编成 6 卷，依次为《中国有了共产党》《红色星火燎原》《战火中成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春天的故事》《筑梦新时代》。每卷既独立成书，连贯起来又构成一个整体，能够系统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概貌。

这套读本在总体设计上有所侧重，用更多的笔墨来讲述中国人民是怎样“站起来”的。因为只有先“站起来”，才谈得上“富起来”和“强起来”；这样的侧重更能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优良传统，你们也需要重点学习和了解。

这套读本在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方面，努力贴近青少年的阅读习惯、接受能力，尽量避免空泛说教，力求以生动形象的党史故事作为切入点，从小到大，由浅入深，讲清来龙去脉，剖析前因后果，引发思考共鸣，实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在版式设计上，注重图文并茂，强化视觉冲击，以增强可读性、趣味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青少年时期正是广泛汲取知识的最佳人生阶段，读党史可以帮助你们更好地了解国情、党情和近现代中华民族兴衰成败的曲折历程，深刻领会党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 and 优良传统，使红色基因浸入心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进一步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认同与热爱，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

少年强则国强。今天的青少年，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经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赶上了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历史机遇。

新时代为青少年朋友们开启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搭建了人生奋斗的出彩舞台。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你们应自觉激发爱党爱国爱人民的高尚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刻苦学习知识，坚定理想信念，磨炼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

中国有了共产党

刘晓宝 著

★ 中国有了共产党 ★

卷首语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如今这一论断已经是尽人皆知。

如何深刻理解这一论断呢？首先要弄清楚建党时期的天是什么样的天、地是什么样的地，也就是说，要把建党活动放到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大环境里加以分析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开天辟地”的深刻内涵，才能切实认清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

万事开头难。

当中国昂首迈入 21 世纪，当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当我们漫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繁华热闹、现代时尚的大都市的时候，可曾想过：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当年中国是怎样迈入 20 世纪的？

再将目光回溯到 150 多年前的 19 世纪下半叶，面对长夜漫漫、战乱频仍的旧时代，面对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旧中国，谁能够把处

于水深火热之中、备受欺凌和压迫的劳苦大众拯救出来，实现民族解放、人民富裕？谁能够把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中华民族凝聚为团结一心、自强不息的民族，求得民族独立，实现民族复兴？

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

如果从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算起，中国人民在黑暗中苦苦摸索了 81 年，才看到了一线光明。

1921 年的盛夏，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从此，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曙光！中国人民的命运迎来了转折！中华民族的前途有了希望！

20 世纪和 21 世纪中国面貌的鲜明对比，已经昭示并将继续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

目录



- 一 近代中国是怎样衰落下去的? 1
- 二 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斗争为什么屡遭失败? 17
- 三 为什么说不能把中国共产党称作“早产儿”? 35
- 四 为什么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 57



- 五** 中国怎样吹响创建共产党的集结号? 77
- 六** 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不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 95
- 七** 共产党为什么要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 109
- 八** 大革命为什么会风起云涌? 127
- 九** 大革命失败给革命者带来哪些沉痛教训? 147

一、近代中国是怎样衰落下去的？



20 世纪 30 年代，北京、上海曾对高级知识分子做过一个调查，其中有个问题是：你的梦想是什么？

著名作家林语堂这样回答：“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这样回答：“没有人吸鸦片，吞红丸，这是最重要的事。这种嗜好延长下去，非灭种不可，任凭有极好的政治制度，也是无益的。”

著名文学家施蛰存这样回答：“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你知道，先生，现在是不敢骂的。”

为什么那时的中国与“五千多年文明古国”反差这么大？为什么这些梦想现在听上去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悲呢？

近代中国到底是怎样衰落成这样的呢？

叩头还是鞠躬？

观念僵化错失历史机遇

1793 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出了 700 多人的庞大使团，由特使马戛尔

尼率领舰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使团携带英国工业革命后取得的尖端科技成果，如地球仪、望远镜、蒸汽机、棉纺机、迫击炮、步枪等，作为庆贺乾隆皇帝 82 寿辰的礼物，希望借这次机会与中国正



乾隆皇帝像

式建立外交关系，实现双方贸易开放。

可惜，当时的清王朝统治者对世界大势茫然不知，仍然自诩为“天朝上国”，将中国以外的国家一概视为“夷狄蛮貊”，就是野蛮人的意思；把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斥为“奇技淫巧”，就是让人着迷上瘾而又没啥大用处的东西。

因此，当“蛮夷”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拒绝对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时，乾隆皇帝虽然准许他按英国礼节单膝下跪呈送国书，但断然拒绝了英国使团关于拓展两国贸易的全部请求。

23 年后的 1816 年，不死心的英国再次派出使团来中国，希望强强联合，进行贸易，但当朝的嘉庆皇帝跟乾隆皇帝当年一样，坚决要求使团行跪拜礼，英国使节则坚持只能行脱帽鞠躬礼，双方再次不欢而散。因为礼节问题，中国再次错过了融入世界、顺应潮流、实现发展的机会。

1840—1842 年，已看透大清帝国徒有其表这一现实的英国，为保护鸦片贸易，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没有用外



马戛尔尼像

交打开的大门，用战争打开了；清朝以不磕头为由拒绝的对外开放，用卑躬屈膝、割地赔款的方式接受了。对此，当时的美国总统小亚当斯敏锐地指出：“鸦片战争的真正起因，不是鸦片，而是叩头。”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皇帝都不屑、不愿、不想让自己的国家与外国开放交流呢？根本原因就是思想观念的保守落后。

明朝实行“海禁”，清朝只许“一口通商”，中国一直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简单地说，一方面，就是“自己人别出去”，禁止出海离境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往来。即使明代郑和下过西洋，那也只是为了扬国威、炫武力。其背后的心态，就是觉得中国地大物博，不像英国、日本等国土狭小的岛国，需要通过贸易才能满足自身需求。因此，盲目自大的中国人不稀罕从海外获得货物，更谈不上学习外国，一心只想关起门来过自给自足的“好日子”。另一方面，就是“外人别进来”，严格限制海外各国洋人来华贸易。在古代，中国一直以接济远方穷亲戚的心态对待海外列国，但凡外国使臣朝贡，只需带很少的礼物来，走时却能得到价值为礼物数倍的封赏，骄傲自大的虚荣心自此养成且日益膨胀。

闭关锁国在中国称雄天下之时可能没什么大问题，但在世界其他国家迅猛发展、不断崛起时就会成为战略性错误。

17世纪中叶的世界形势，就发生了清朝皇帝浑然不觉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640年英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枷锁，代之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1760年英国又开始了工业革命，从工场手工业

向机器大工业过渡。随着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建造、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还有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等，人类对大自然的征服力越来越强。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200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疯狂的对外掠夺和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然而，就在西方海外殖民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乾隆皇帝仍不能正视世界形势的变化，不是顺应潮流，而是采取鸵鸟政策，更加严格地限制对外贸易。

1787年，曾开创盛世、多次平叛，后来自称“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写了一首诗：

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

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

用通俗的话来解释这首诗，大致是这样的：近几年，隔三岔五总有外邦小国的“粉丝团”前来，可我天朝上国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所以我们宁可闭关不开，也不能让这些“粉丝团”来烦扰或带来危险。现在大清国运昌盛、形势极好，有时暗暗想到月盈月亏的自然规律，心里不免有点儿小担心呢。

英明神武如乾隆皇帝，在中国对外交往和走向世界方面的见识尚且如此，其他皇帝思想保守的程度更不难想象。

正是在长期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商人不能主动去寻找海外市场，导致手工业发展缓慢；中西方文化交流不畅，阻碍了中

国近代科技的发展。

对此，当时远在西半球的马克思在了解中国国情后，十分痛惜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富了就会强吗？

腐朽制度使人心散如沙

19 世纪初，当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并对外实行大规模的殖民主义扩张时，中国

正处在封建社会的晚期，在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的封建制度日趋僵化保守和失去活力。清王朝自嘉庆以后国势日衰，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政治上更加腐败，官场贪污盛行、贿赂成风。道光年间军机大臣穆彰阿揽权卖官、假公济私，无能之辈只要给他送一份厚礼，就能升官晋职。直隶总督琦善于 1841 年被抄家，查抄出的家产有黄金 1 万多两、白银 1800 万两、珠宝 11 箱。中央大员如此，地方文武官员也大都搜刮无度。“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就是对当时清朝吏治腐败的生动写照。

经济上生产凋零，贫富分化加剧。贵族、官僚、地主利用各种手段兼并土地，其结果是土地集中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加之耕作技术保守落后，农业、手工业徘徊不前，普通

老百姓尤其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更为艰难。

军事上武备松弛、装备落后，军纪败坏、士气不振。清朝中期虽有八旗兵和绿营兵 80 余万人，但乾隆之后天下承平日久，和平积弊日渐深厚，昔日的“草原雄鹰”由于缺乏训练、终日闲游，甚至聚众赌博、酗酒狎妓，战斗力每况愈下，终于变成了提笼中的“八哥”“画眉鸟”，实际上已担当不起保卫国家的重任。

有的人可能会说，就算是这样，当时的中国也是世界上数得着的富国，也不至于被人随便欺侮。

的确，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统计，1830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1/3，要知道，现在美国经济总量也只是占世界经济总量 25% 的水平。当时的中国可谓富甲天下，无可匹敌。

富国并不自然就是强国。

清王朝虽然富有，但主要富在统治集团和地主阶级，而不是广大民众；富在私有财产，而不是国有财产。“康乾盛世”之后，嘉庆皇帝靠查抄了巨贪和珅的全部家产才填补了严重的财政赤字，所以才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皇帝权贵有钱大修宫殿园林，贪官富商有大把的银子买鸦片快活，清政府却没有多少银子发展新式武器，甚至连军饷都发不下去。

富而腐化，富而不强，清朝就像一个营养过剩、沉迷玩乐、体质虚弱、毫无斗志的大胖子，中看不中用。

只要齐心协力、同仇敌忾，就算打不赢，也能打个平手吧？

但这只是一种可能、一个愿望而已。

残酷的现实，正如近代大思想家严复所指出的：“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

封建制度下的中国，王朝的变换只不过是占据皇帝宝座的家族的变换而已：

汉朝是刘家的，唐朝是李家的，宋朝是赵家的，明朝是朱家的，清朝是爱新觉罗家的。

普通老百姓追求的是《桃花源记》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理想生活，不管皇帝姓啥，也不管是何朝代，只要能解决温饱就行。他们甚至认为，洋人来中国抢的是皇帝的地，赔的是皇帝的钱，与自己何干？正因如此，孙中山后来才痛心疾首地说：“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这是近代中国遭受屈辱、贫穷落后的内在原因。



严复（1854—1921），我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

落后就要挨打，富而不强 就会任人欺凌

19世纪，英国为改变对华贸易逆差，采取了向中国走私贩卖鸦片毒品的可耻手段。

虽然清政府严禁鸦片进口和内地商人贩卖鸦片，但在腐败官员

和不法商贩的参与下，鸦片输入从乾隆初年的每年约 400 箱，到嘉庆初年的每年约 4000 箱，到道光十五年（1835）时达到了每年 30000 箱。

鸦片贸易使英国榨取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钱，而使中国人变成了“东亚病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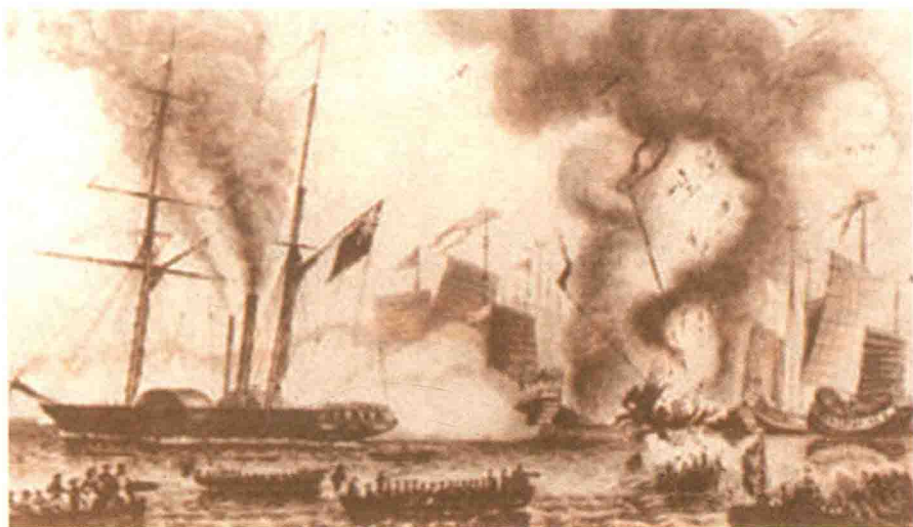
1839 年，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将收缴的全部鸦片用盐卤和石灰销毁，从销烟池倾入大海。这一事件被称为“虎门销烟”。虎门销烟显示了中国人民严禁鸦片和反对外来侵略的决心与魄力。

禁烟运动对中国而言是正义之举，但英国政府和鸦片商人却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于是，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战争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840 年 6 月—1842 年 8 月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统帅率 28 艘军舰、15000 人，靠坚船利炮攻城略地、杀人放火。清政府战无强兵、抗无斗志，爱国主战的钦差大臣林则徐被革职发配新疆，投降妥协的大臣琦善却被道光帝认为是“片言片纸，连胜十万之师”。最终结果是清政府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设领事馆；赔款 2100 万银圆。

《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不仅破坏了中国领土完整和关税司法的主权，更开创了用条约形式使外国势力掠夺和奴役中国“合法化”的先例。

为什么 19 世纪的中国会被那么多国家轮番侵略？就是因为第一



1841年侵华英舰在炮轰中国战船。

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出现了“破窗效应”。

1840年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西方侵略者纷至沓来，穷凶极恶地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把中国一步步地推入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深渊。

翻开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那上面记录的都是屈辱和血泪。

1856年10月—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长驱直入，在北京杀人放火，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被付之一炬。今天的我们，只能站在圆明园废墟上想象它曾经的美。

1894年7月—1895年4月，中日甲午战争。面对全国经济总量不足自己1/10的日本的侵略，清政府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2.3亿两白银，合3.65亿日元。清政府的赔款甚至超过了当时日本全国经济总量2.15亿日元。



1842年8月29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在英舰上签订。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了极大的刺激，谭嗣同奋笔写下：“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梁启超发出了“唤醒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的呼喊。

1900年5月—1901年9月，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数十倍于敌的清军、义和团抵挡不住实际不到2万人的联军部队。京城北京陷落，皇帝狼狈出逃，古都尸横遍野、残遭洗劫，清政府更签订了空前不平等的条约——《辛丑条约》。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分“势力范围”、设立租界、驻扎军队，并获得了4.5亿两白银赔款。4.5亿两白银，四亿五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

至此，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当世界许多国家在欢庆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却是在屈辱中进入20世纪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4次大的战争，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还有1883年的中法战争、1888年英军入侵西藏的战争、1900年沙俄入侵东三省的战争、1903年英军第二次入侵西藏的战争、1904年日俄为争夺我国东北而在中国领土上展开的战争。这9次战争累计13年零3个月，这意味着中国人民从1840年至1905年的66年中，有1/5时间是在挨打中度过的。

据统计，在此期间，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订立的条约、章程、合同和专条达到300个，侵占中国领土173.9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法国或7个英国本土的面积。

在这几十年里，外国侵略者索取的战争赔款、赎城费、犒军费以及经济掠夺、战争破坏造成的损失等项，总计约千亿两白银，而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仅有8000万两白银。这岂不是要被奴役上千年才能还清！



1901年，清政府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清末反映列强侵略中国形势的《时局图》。图中熊代表沙俄，虎代表英国，蛇代表德国，蛤蟆代表法国，太阳代表日本，鹰代表美国。

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掠夺，使中国主权丧失殆尽，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痛不欲生的深重苦难。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最痛彻心扉的领悟。

“多屈辱啊！多耻辱啊！那时的中国是待宰的肥羊。”1个多世纪后，当习近平总书记回顾这段历史时连连感叹。

名言金句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

——习近平

读党史 长智慧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总是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陶醉在昔日的辉煌中，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开放的心态，不能始终紧跟世界潮流去变革、求进步、谋发展，即使再优秀，也会渐渐落伍、终被淘汰。

近代中国，于内，制度僵化，腐败丛生，民不聊生；于外，先自我陶醉、闭关锁国，后面对强权侵略软弱无能、妥协投降。随着一次次战争的失败、一次次割地赔款，大好河山寸寸沦丧，国家积贫积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长夜漫漫，中华民族在衰落中陷入百年沉沦。

落后就要挨打，奋斗才有希望。国家如此，个人何尝不是这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与生活在旧中国的人相比，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你们是何等幸运！旧中国的屈辱历史必须永远铭刻在心，旧中国的惨痛教训必须深刻吸取。青少年朋友，你们要坚持把自己的人生追求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不懈奋斗，顽强拼搏，这样才能走好人生的每一段路程，到达高远的境界。

二、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斗争为什么屡遭失败？



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面对近代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深刻的社会危机，中国的仁人志士不甘被侵略、被奴役，为反抗外敌和改变现状，纷纷踏上了救亡图存的漫长道路。

那么，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到底谁能引领中国人民摆脱苦难、走上富强之路呢？



魏源（1794—1857），清代思想家、政治家，“经世致用”思想的代表人物。

1842年，一个叫魏源的湖南人编写了一部介绍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和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抵抗强敌的侵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这个设想现在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在魏源生活的时代，可是石破天惊的论述。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沉迷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认为中国要比“夷人”先进得多，怎么会去跟“夷人”学习呢？魏源因此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为了探索新的出路，中国社会各阶级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主张，进行了多种尝试，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海国图志》书影

农民：“拜上帝会”

和画符念咒

在近代中国苦难最深重的时候，最先行动起来进行反抗、试图改变中国衰落现状的，不是位高权重的开明皇帝或官员，而是由落第的知识分子领导的中国西南边陲的农民。这次农民起义史称“太平天国运动”。

知识分子最先明白道理，而农民则最先起义反抗，这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中国农民有深刻了解的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从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的军费开支和战争赔款逐年增加，地主官僚的剥削压榨层层加重，身处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受到的压迫最深重，生活难以为继，甚至家破人亡，所以反抗的意愿最强烈，斗争的决心最坚定。

他们是怎样走上反抗之路的呢？纵观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大多数农民起义有一个突出特点：利用宗教迷信来制造舆论，笼络人心，形成一定的势力和团体，然后走上反抗之路。

从秦末陈胜、吴广的“鱼腹丹书”和“篝火狐鸣”，到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太平道”、北宋方腊起义的“明教”，再到元、明和清初的“白莲教”等，都是借助天命思想向人们说明旧王朝天运已终，新的时代和政权即将到来，起义首领已经得到了“上天”的授意和护佑，参加起义的人要誓死跟随。

鸦片战争之后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它也借助了天命思想，不过它引以为据的这个“天命思想”十分“洋气”。

1837年，广东花县有个叫洪秀全的读书人，3次在童生试中落选，第三次落选时他都已经23岁了，却连秀才的功名也没有获得。洪秀全科举屡试失败后，创立了拜上帝会，用来组织和准备农民起义，并发展了大批信徒。

1851年1月11日，37岁的洪秀全领导约2万人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部队称“太平军”。

太平天国立志推翻清朝的统治，对清朝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概不认可，并严格禁止鸦片买卖。太平军将士作战英勇，一路诛杀贪官污吏，焚烧地契债券。太平军的这些做法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和支持，农民们踊跃参军助战，打破了清军的多次围攻，打败了清政府从各省调集的大批军队。

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改称“天京”，建立起太平天国农民政权，颁布了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希望建立起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



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人，太平天国领导人。



太平天国颁发的田产凭证

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这一土地纲领反映了千百年来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对于发动和鼓舞广大农民起来参加反封建斗争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方案带有很大的空想色彩，在实践中难以施行。

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攻破了清军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事上达到鼎盛时期。但是，这时的洪秀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不思进取，只想着如何享受，导致内部不断争权夺利。

以反对皇帝的名义发动起义的洪秀全，定都天京后却过起了帝王生活。天王临朝时，官员都要按照仪式跪拜，呼喊“万岁”。他花费巨资修建了豪华的天王府，后宫嫔妃和服侍的女官共有 2300 多人。从 39 岁进城到 50 岁自尽，他在奢华的天王府中度过了 11 年，从未走出天京城门一步，严重脱离前线。

此外，洪秀全还滥封王。他用人唯亲，排除异姓，结果导致诸王相互猜忌、自相残杀。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在内斗中被杀，史称“天京事变”。翼王石达开因被天王猜疑，负气带领 20 万将士出走，最终兵败大渡河，被清军杀害。

至此，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1858 年，清军乘机大肆反攻，并重建“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围困天京。晚清名臣曾国藩率领湘军、淮军分 3 路围攻太平军，并联合英、法、俄、美等国在华的武装



太平天国铸造的钱币“天国圣宝”铜钱

力量，共同打击太平军。

1864年7月，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最终失败。

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席卷18个省，攻克600多座城市，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政权，达到了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巅峰，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1898—1900年，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之际，中国北部地区爆发了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震撼了中国大地。



义和团战士



1859年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编撰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

义和团，最早称为“义和拳”，是与白莲教、大刀会等密切相关的民间秘密组织。义和拳成员练拳习武，画符念咒，认为请“神仙”附在自己身上就能刀枪不入。清政府对义和拳一开始是禁止的，后来采用招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改名“义和团”。

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凭借原始的大刀、长矛，以异乎寻

常的勇敢精神同拥有先进武器的八国联军进行殊死搏斗。那些本来认为中国可以任意宰割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做梦也没想到中国社会底层竟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

但是，义和团先是被慈禧太后利用来对付西方列强；后来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仓皇外逃的慈禧太后又妥协投降，下令“剿灭”义和团。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夹击下，义和团运动很快就失败了。

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悲剧有力地证明：农民受到落后生产方式的限制，提不出科学的、有远见的斗争纲领；如果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的，也不可能领导中国近代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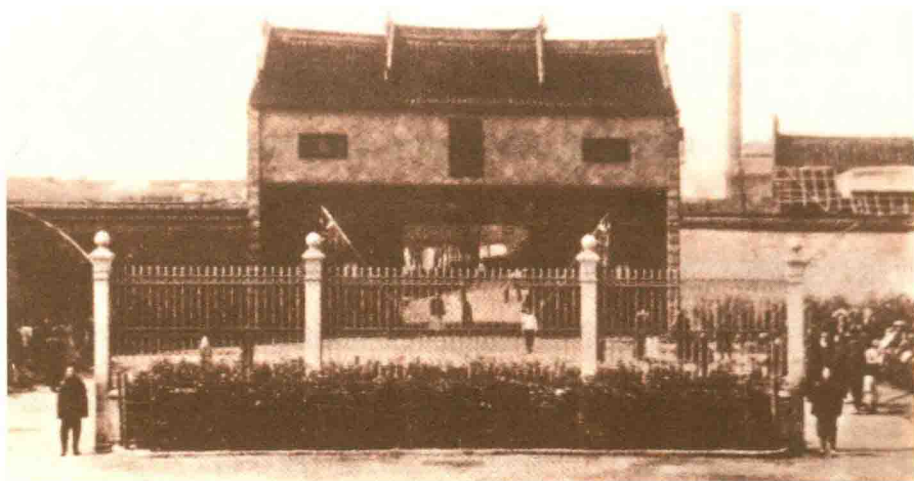
开明皇帝和官员：

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在死水一潭的中国封建社会激起轩然大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

1861年，为挽救时局危机，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开明派推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他们提出“自强”和“求富”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近代工业，生产新式武器，建立新式军队，企图继续维持清政府的统治。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清政府开办了煤矿、兵工厂，建立了在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图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大门。

当时世界海军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北洋海军，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也发展了起来，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然而，中日甲午战争中，洋务派苦心经营的中国新式陆、海军一败涂地，持续 30 多年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近代中国首次大规模的模仿和学习西方的运动变成了一场失败的自救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1898 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史称“戊戌变法”。

维新派试图对中国的旧制度进行改良，按照英、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建立起君主立宪制。

在短短的 103 天中，维新派拥戴光绪皇帝发布了 100 多道变法诏书、谕令，内容包括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废除八股文、裁汰冗员、澄清吏治、广开言路、准许组织学会和开设报馆、给予出版言论自由等。但是，手握实权的慈禧太后等守旧派势力强烈反对变法，处处设置障碍，不让新法顺利推行。当时的变法先锋康有为在被光绪帝召见时，鼓励皇帝拿出变法的勇气和决心来，这样 3 年就能使朝政有大的改观。光绪帝虽然同意康有为的说法，但却叹息说：“奈掣肘何？”意思是旧势力非常强大，自己也无可奈何。

果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很快就发动了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除了开办京师大学堂（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以外的所有新政措施全部被取消。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抱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遗憾，血洒京城菜市口。

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上是根本行不通的。

中国的封建统治就像在风雨中矗立了几千年的旧房子，已经破败不堪，任凭怎样努力地修补，也难以改变其腐朽倒塌的命运。

越来越多的人对清朝统治者不再抱有幻想，认为要救中国就要进行革命。



1919年3月长兴书局出版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著作《大同书》

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19世纪末，几乎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发动的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了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为目标的革命斗争。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第一次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识到，寄希望于清政府体制内的自我改革是不可取的。因此，怎样唤醒民众起来反抗，推翻清政府和封建帝制，就成为当时革命志士苦苦探索的问题。

1905年，孙中山明确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三民主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反映了当时中国民众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迫切愿望。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以湖北新军为主力，发动武昌起义，并迅速取得成功。各省纷纷响应，进而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革命风暴。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民国纪年由此开始。

新政府制定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



孙中山（1866—1925），
广东香山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武昌起义军攻破湖广总督衙门。

约法》，颁布了一系列废除封建陋习的新措施，如改用阳历、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下级对上级官员不再行跪拜礼等，反映出除旧布新、矢志共和的精神。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大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

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当时国内外形势复杂，南方革命派与清政府进入和谈阶段。掌握清政府军政大权的袁世凯先是以“君主立宪”为名，一方面扮演朝廷的“忠臣”，以换取清政府的信任；一方面对革命派施加压力，以夺取大总统之位。待确定孙中山会在清帝退位后将大总统之位让给他时，袁世凯又立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称“共

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表示坚决拥护民主共和。

由于帝国主义的干预，革命力量与北洋军阀相比处于劣势，加上革命派内部的动摇，在袁世凯表示拥护共和并逼迫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职。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篡夺，中国从此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很快就背弃了先前的种种承诺，实行独裁专制，做出了一系列破坏民主共和的举动，向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刀，镇压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与日本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最终于1915年12月12日上演了一幕称帝的丑剧。

1916年，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后，中华民国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局面，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仍



1912年1月5日孙中山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次国务会议。

然占据着统治地位。

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系。

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掌握北京中央政权，并统治山东、河南、安徽、福建、浙江等省。

以冯国璋和他的继承人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则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台，统治直隶、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并同皖系争夺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

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统治东北三省，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扶植下，逐渐把势力扩张到关内，同直、皖两系争夺北京中央政权。

为了巩固和扩大地盘，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频繁的争夺乃至战争。军阀混战使中国陷入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而且为了支撑战争，各派军阀不断通过出卖国家利益向列强借款，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愈陷愈深。

当时的人们这样描述军阀的所作所为：“这些人，什么事也不做，只晓得坐坐汽车，借借外债。他们的第一件事是卖国，一点一点地卖给外国强盗；他们的第二件事是每天、每小时、每分钟把自己卖给外国强盗。”孙中山沉痛地说：当时的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

为此，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并在广州建立了南方革命政府，但力量相对较弱，难以结束军阀割据、混战不断的局面。

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这正如同盟会元老、辛亥革命功臣蔡济民在《书愤》一诗中所写的：

风云变幻感沧桑，
拒虎谁知又进狼。
无量头颅无量血，
可怜购得假共和。

辛亥革命后的一系列历史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可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买办统治下的中国实现，中华民国只剩下一块招牌而已。一位清朝遗老编了一副对联，讽刺当时的“民国”现状：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这种局面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和对资产阶级革命充满期待的人们深受打击，沉浸在苦闷和彷徨中。

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名言金句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

——毛泽东

读党史 长智慧

历史是公正的，在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舞台上，社会各阶层都曾有过表现和施展的机会。

历史也是残酷的，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起义的路走不成，改良主义的路走不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路走不通。在强大的中外反动势力面前，农民、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难以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

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这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

代表了当时一部分革命志士的心路历程。

历史进程犹如大浪淘沙，中国救亡图存的责任就这样历史性地落到了新兴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青少年朋友们，你们正处在追逐梦想的美好年华，满怀着改变世界的强烈愿望。这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但你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抵达梦想的彼岸，不可能轻而易举，道路难免曲折坎坷，要经历反复考验，最关键的就是要坚信——失败是通向成功的阶梯。

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为了理想，坚忍不拔、不懈奋斗，才能创造无愧于时代的壮丽人生。

写给★
青少年的★
党史

三、为什么说不能把中国共产党称作“早产儿”？



自 1861 年开始，洋务派开展洋务运动，企图在不改变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前提下，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而实现富国强兵，但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中黯然收场。这证明只请“赛先生”（即“Science”，指科学）是救不了中国的。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派企图通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却只推翻了清朝皇帝的封建专制统治，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没能从根本上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这证明“德先生”（即“Democracy”，指民主）来了，也没能救中国。

因此，有人说，中国的封建残余太顽固、民族资产阶级太软弱，列强对中国的殖民压迫太严重，中国从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困难重重，只能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里苟延残喘。这样的论断过于悲观了。

1917 年，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为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在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也没有被人们重视。1919 年 5 月，中国爆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1920 年 8 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1921 年盛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



列宁（1870—1924），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缔造者，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

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又过了28年后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事实证明，“马先生”（即“Marxism”，指马克思主义）来了，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浴血奋斗，中国的面貌才得以改变。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海外一些研究中共党史的所谓“学者”一再散布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早产儿”的观点，说中国共产党是苏俄强行输出革命的结果。其理由是当时中国的工人阶级力量还很弱小、社会生产力发展落后等。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把中国共产党称作“早产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思想启蒙：从思想 革命开始

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

息，知道

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这是现代文学家鲁迅的小说《阿Q



鲁迅（1881—1936），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正传》中所描写的辛亥革命时底层社会的情形。

辛亥革命虽然废黜了坐在皇宫龙椅上的清朝皇帝，但革命很不彻底，封建思想和帝王意识仍盘踞在一些人的头脑中。特别是袁世凯爬上大总统宝座后，一心想当专制独裁、权力世袭的皇帝，为此在文化上大搞尊孔复古。一些清朝遗老、封建文士相继组建了“孔教会”“孔道会”“孔圣会”“孔社”等团体，甚至成立“上海灵学会”，并出版了《灵学丛志》，公然宣扬封建迷信。

虽然袁世凯被赶下了台，但残酷的现实说明，通过暴力手段推翻一个政权容易，但要改造一代人的思想却既艰难又漫长。

一批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痛苦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深刻反思中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唤醒多数国民的思想觉悟、破除封建思想文化的枷锁。

鲁迅在短篇小说集《呐喊》的自序部分说：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和他有同样观点的，还有一个人，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第一号起更名为《新青年》），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封建的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的风暴。图为中国画《陈独秀与〈新青年〉》（胡伟 画 中国美术馆藏）。

1915年，36岁的陈独秀从日本返回上海，对北京政府与日本刚刚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十分愤怒。不过，与一些激进的爱国青年不同的是，他没有停留在抗议和反对上，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而“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

历史实践证明：每当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候，总有一场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自第二



卷第一号起更名为《新青年》。他以此为阵地，对封建主义思想、道德、文化发起了猛烈进攻，大力倡导民主、科学精神，反对迷信盲从、蒙昧无知，鼓励人们摆脱被奴役的地位，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以前，封建文人认为只有用文言文创作的古文、诗、词、赋等才是文学的正宗，是属于上等社会的；用老百姓的大白话创作的戏曲、小说等则是旁门左道，是属于下等社会的。

而用文言文写的、包含大量生僻字的那些典籍，别说是当时读书识字少的普通老百姓看不明白，就是我们现在读起来也是一件头痛的事。



胡适（1891—1962），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

正因如此，胡适、陈独秀等又发动了文学革命。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药》等优秀白话文小说，以犀利的文字和深刻的思想，对封建社会“吃人”制度进行了血泪控诉，成为文学革命的旗手。

关于当时的白话文运动，还有这样一则故事：

一次，胡适在北大讲课时，一些醉心古文的学生对他有抵触情绪，向胡适提问说：

“胡先生，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很肯定地说：“没有。”学生不服气地道：“白话文不精练，打电报花钱多。”胡适则柔声细语地说：“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电报，邀我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回电拒绝，用白话文很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以用文言文编一则复电。”10分钟后，学生们挑选出一篇字数最少的电文：“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看了一下，微笑说：“这是12个字，可我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新思想、新生活、新文学，唤醒了在封建腐朽文化“铁屋子”中熟睡的人们，为后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文化基础，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理论传播：试看将来的环球， 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使

在辛亥革命失败后陷入苦闷彷徨中的中国人看到了中华民族自救复兴的曙光。

正如后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18年，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多篇文章，直面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形势。他满怀信心与激情地写道：

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
都是布尔什维克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克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为进一步探讨和传播马克思主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义理论，李大钊将《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专号》，还亲自撰写了2万多字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详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这3个部分“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1920年3月，李大钊与北京大学进步师生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9月，陈独秀领导的上海早期党组织决定将《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号起改为党的刊物，公开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这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就形成了两个中心：北方中心位于当时的北京政府所在地和政治中心北京，南方中心位于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上海。两个中心南北呼应，形成了较大的传播声势。

更为重要的是，一批先进分子在研究介绍中逐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用以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五四运动：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开启建党准备

1919年1月，英、法、美、意、日、

中等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虽然没有出兵参加一战，但因对德、奥等同盟国宣战，并向欧洲战场派了几十万华工，做出了重大牺牲，因而成为战胜国之一。

在备受欺凌的日子里，这个消息着实让许多中国人兴奋不已。一些媒体甚至撰文宣称：中国由此转机，将废除不平等条约，可以与英、法、美并驾齐驱了！

然而，在所谓的“和平会议”上，英、法、美等国面对日本的强硬态度，竟然选择用牺牲中国的权益换取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决定把原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全部转交日本，并作为正式条款写入《凡尔赛条约》。

期望值越高，失望带来的痛苦就愈加强烈。中国的屈辱境遇激

发出来的满腔悲愤，再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震撼与鼓舞，终于点燃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怒火。

1919年5月3日晚，1000多名北大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陆续汇集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热血沸腾的爱国学子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发言，痛批列强的虚伪面孔和侵略本质，斥骂北京政府的软弱与卖国。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不已，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用鲜血写下“还我青岛”4个大字。学生们激情高呼：“决不能让山东沦入侵略者之手！”“还我青岛！还我山东！”

5月4日下午，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大游行正式拉开帷幕。

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聚集到天安门前，举着旗帜和标语，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还散发了许多传单。其中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写道：

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当学生队伍游行至东交民巷西口时被铁栅栏挡住了，英、法、美、意4国使馆的工作人员都说公使外出了，不能接收支持中国人民收回山东权益的意见书。学生代表就同巡捕交涉，要求让游行队伍从使馆区通过。巡捕却说必须大总统同意才行，提出要用电话与总统府联系，结果去了两个小时也没见回来。

学生们顶着烈日站了两个多小时，情绪越来越激动。明明国家还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向天安门进发。

没有亡掉，但自己的国土已不能通行，自己的政府还要来阻碍。这时有人高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到曹汝霖家找卖国贼算账去！”这一提议马上得到大家响应，游行的人群转向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家。

曹汝霖在袁世凯时代先后任外交次长和外交总长，是“二十一条”谈判的主事人。学生游行时，大总统徐世昌在为刚刚归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接风，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到场作陪，并不在家。席间，其他人都劝曹汝霖暂时不要回去，先躲避一下。曹汝霖却认为一群赤手空拳的学生不能把他怎么样，还邀请章宗祥一道去他家。

4点多钟，游行学生到达赵家楼胡同。他们一边高喊“卖国贼曹汝霖滚出来”，一边砸门。军警们上前阻拦。这时，人群里突然

有人喊：“进去了！进去了！”

最先闯进曹汝霖家的是22岁的匡互生，湖南邵阳人，自小习文练武。院内军警没想到学生们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惊慌之余连忙上前阻拦。匡互生激动地说：“弟兄们，中国要亡了！我们是来找卖国贼曹汝霖讨公道的。希望你们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不要干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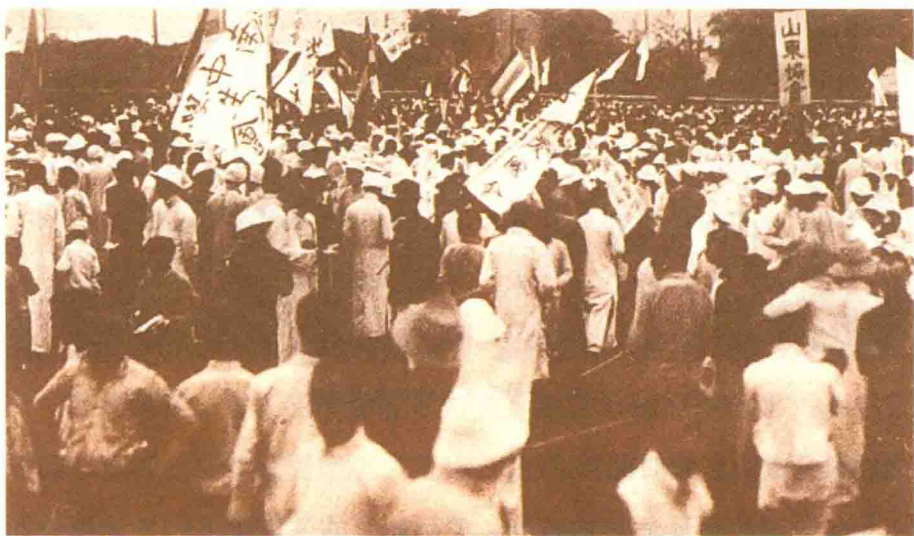
军警被学生们的勇猛与爱国热情感动，加上外面人群和口号声的震慑，就站在旁边观望起来。翻墙进来的学生立即打开大门，把潮水般的人群放了进来。

正在客厅里的曹汝霖等人听到学生们闯进来，一下慌了神。情急之下，曹汝霖躲进卧室旁边的箱子间，章宗祥被一个仆人拉着藏进了曹家的地下锅炉房。

学生们涌进曹宅，一边高喊“卖国贼在哪里”，一边到处寻找。看到曹家摆设的全是日本货，墙上还挂着日本天皇像，学生们愤怒了，一些学生喊道：“把这个贼窝给烧了，看卖国贼往哪儿躲！”几个学生就卷起一块地毯点着了，又有人从车库找来汽油倒在地毯上，火势越发大了起来。

躲在锅炉房里的章宗祥看到浓烟立刻跑了出来，想从后门向外逃。学生们看他身穿西装，误以为是曹汝霖，就高喊：“曹贼在这儿！”一边喊，一边冲上去用小旗、拳头猛打。不一会儿，大批军警赶到，大部分学生安全撤离，32名学生被捕。这就是“火烧赵家楼”事件。

为营救被捕同学，5月5日，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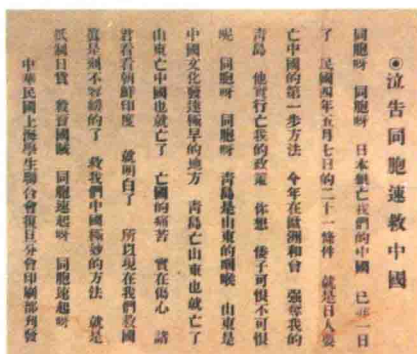
1919年5月7日，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了声援北京学生的国民大会。

学生纷纷罢课响应。两天后，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

6月1日，北京政府连下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表彰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另一道命令是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

卖国竟然有功，爱国反倒有罪！学生们对北京政府的倒行逆施异常愤怒，决定从6月3日起恢复一度中断的街头演讲，并声称如果当局要抓演讲学生，就要加倍出动，直至反动军警把全体学生都捕完为止，决不放弃斗争。

6月3日，2000多名学生涌向街头，开展大规模的公开演讲，反动军警逮捕了170多人，北大法科被当作临时监狱。第二天，4000多名学生上街演讲，又被捕700多人。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北



五四运动时期在上海散发的传单

大理科又被当作临时监狱。

在爱国学生最危难的时刻，各行各业的劳苦工人们主动挺身而出。

6月5日，由上海日资棉纱厂工人带头，铁路、电车、船坞、清洁、轮船等许多行业的工人和店员纷纷参加罢工，罢工运动高潮时参与人数达到10多万。

工人们在罢工的过程中团结一致，打破了原来行帮厂会间存在的隔阂，共同商议斗争的步骤与策略。在罢工期间，工人们虽然拿不到工资，但是仍主动捐出自己的血汗钱来支援爱国运动。这表明：这次工人罢工由以前的经济斗争开始转向政治斗争。

接着，上海大中小学全部罢课。学生们走上街头，挨家挨户地动员商户罢市。如果有店主不愿关门罢市，学生们就跪在店门前，哭着求店主为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而参加爱国行动。

到6月5日上午12点，上海所有商铺全部罢市。

一些理发店贴上了“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这

样的标语。

有家商店的经理强令伙计开店营业，伙计们却宁愿被扣薪水来弥补店里的损失，也不愿营业。经理没有办法，只好关门大吉了。

有一个店的店员还写了一张血书贴在店门上，写着“学生一日不放，本店一日不开”的标语。

至此，上海形成了全市性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局面。

与此同时，罢工斗争像燎原野火一般在全国燃烧起来。沪宁、沪杭、京汉、京奉铁路工人，天津、杭州、九江等大小百余城市的工人相继罢工。中国工人开始以独立的姿态、以大规模的行动走上政治舞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

6月10日，北京政府迫于压力公开宣布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等卖国贼的职务。至此，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1919年6月，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

然而，没过几天，北京政府正式通电远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命令中国专使在和约上签字。这件事被报纸披露出来后，立即引起全国范围内的震动。

全国许多地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拒签和约的斗争。各地的电报纷纷飞向北京和巴黎。据《每周评论》报道，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曾收到 7000 多份来自国内各界要求拒签和约的电报。

6 月 28 日是巴黎和约的签字日。这一天天还没亮，中国驻巴黎的各专使寓所就被法国的中国工人和留学生们团团围住。工人和学生们不准专使出门，并说：“如果有专使要出门，不管是不是赴会，将立即被杀。今天绝不允许有一个中国代表出现在巴黎和会的签字现场。”

为了防止有人临场退缩，集会中国工人和留学生们事先开会签好了一份名单。如果真的有专使出来被杀，他们就按名单签字的顺序去抵命，每一个专使的命用 3 个人的命去偿还他。这种气势和决心最终把中国专使都留在了巴黎和会的签字会场之外。

中国代表拒绝签字的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

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的胁迫之下，中国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列强提出的丧权辱国的条件，中国代表只有接受，不允许打折扣，更不能拒绝。这次巴黎和会签字仪式，中国代表拒绝到会、拒签和约，是公然反抗帝国主义霸权的壮举。这一胜利的取得，主要归功于五四运动的奋起抗争。

在此期间恰好来中国访问的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在给友

人的信中说：“我们正目睹一个国家的新生，而出生总是艰难的。”

191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深深打上了五四运动的烙印。一大批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先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力量。

毛泽东在其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不是“早产儿”，而是在充分的思想启蒙、广泛的理论传播、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中孕育的，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选择。

名言金句

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李大钊

读党史 长智慧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只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而影响力有限，那么五四运动的主力则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从而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汇聚形成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

五四运动一扫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沉闷气氛，带着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进行了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唤醒了广大民众的觉悟，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团结，成为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时代在变，唯一不变的是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内容的五四精神，这种精神在神州大地上不断发扬光大，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人。

2013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讲了一段颇有文采且富有人生哲理的话：“人的一生只有一次

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

青少年朋友，请你们以这段话为座右铭，在奋斗中成长，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梦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写给★
青少年的★
党史

四、为什么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



1920年11月25日，27岁的毛泽东在给同学罗章龙的信中写道：

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选择什么主义、举什么旗帜，是20世纪初叶的进步青年探索人生道路、寻求国家出路时面临的首要问题。

然而，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并确立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马克思主义诞生50多年后才被介绍到中国，来到中国20多年后才被中国的先进分子通过比较和鉴别，从当时盛行的众多的理论和“主义”中选择出来，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探索的道路往往曲折

大约100年前的中国，急于改造旧中国的人们，特别是充满热情、敢想敢干的学生，组织了多种多样的社团，研究和运用流行的救国理论，在广大乡村和城市中大胆开展社会实践，试图从中找到挽救中国的良方。

五四运动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探索救国方案和研究宣

传新思想的潮流。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成为流行语，甚至一些军阀、政客也以谈论社会主义为时尚。

然而，当时人们眼中的“社会主义”，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如新村主义、互助主义、工读主义等等，甚至无政府主义一度在中国更流行。

一些进步青年就像小马过河一样，在比较和试验中探寻真理，选择自己信仰的主义。

1918年6月，受新村主义思潮影响，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寄居长沙岳麓书院时，曾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踏遍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他们在这个新村里自学，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挑水拾柴，把蚕豆和大米煮着吃。但是，这一实验很快就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而中断了。

后来，毛泽东曾设想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医院、公共剧院等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

这是不是有点儿“地球村”的感觉呢？这个设想，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十分超前的。

然而，在北洋军阀的残酷统治下，中国乡村的封闭落后与这种



毛泽东等在长沙创立新民学会，其中有一些会员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图为 1919 年 11 月 16 日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合影。

理想社会的现实差距岂止隔了十万八千里？

不过没关系，既然田园新村建设有困难，富有热情的革命青年又把目光投向城市。

1919 年底，28 岁的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发表了《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提出在全国各大城市建设“工读互助团”的设想。这个倡议得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思想界和教育界名人的广泛支持。

不到半个月，北京大学、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师范学校和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近就开设了 4 个工读互助团，经营日用品、食堂、缝纫、刺绣、洗衣等项目。

不久，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广州等地先后成立工读互助团，试图按照“人人做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过“共产的生活”，然后“用工读互助团去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的结果，就是一个顶大的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的社会”。

恰在此时，毛泽东率领代表团来到了北京，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撤换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在此期间，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对新村式的改良表现出了热情。同时，在与李大钊的频繁接触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白天四处奔波，晚上在一盏小油灯下伏案读书。他读了许多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介绍共产主义的图书。

毛泽东对各种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都进行了研究，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那些未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和透彻了解的问题，他是不肯轻易地做出判断的，所以在给好友的信中，他说自己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在社会时尚潮流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于1920年5月在上海亲身体验了工读互助团的生活。他和几个同学租了几间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承担了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经过亲身实践，他很快察觉到这种团体生活有难以克服的现实弊端，便停止了试验。

同样，各地的工读互助团也很快遇到了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办食堂的，因为“事少人多，入不敷出”，连组织社团的8个人自

己都没得饭吃；开洗衣局的，“办了两个多星期，仅仅收入七十几枚铜子”。

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加入工读互助团就是想躲进“世外桃源”过共产生活，企图以此脱离家庭、脱离学校、脱离婚姻。这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论，各地的工读互助团也随之解散。

事实教育了人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寻求救国救民的新出路。

然而，马克思主义要从当时流行于中国的种种“主义”中脱颖而出，为我们的革命前辈所认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1919年7月，曾经参与发起新文化运动的胡适发表了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主张用实用的态度，一点一滴地去改良社会；认为谈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用处。这种观点听上去很务实，但根本错误就是李大钊、陈独秀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共同的理想和主义，不对社会做根本变革，具体问题就没有根本解决希望。

后来，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也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没有知识，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只能发展资本主义，靠实业富国。这种观点似乎既务实又重长远，却正如李大钊、蔡和森等指出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想把中国作为剥削的对象，并不会允许中国发展真正强大的实业和成为强大的国家。

无政府主义者则更为激进和具有迷惑性。他们主张“灭除资本主义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实现“无地主、无资本家、

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的“十三无理想”，追求“社会上唯有自由，唯有互助之大义，唯有工作之幸乐”的社会目标。这个主张听上去很革命、很美好，却因为在现实中根本实行不了而成为严明组织纪律的阻碍，涣散了革命斗志。

真理越辩越明。通过多次论争，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进一步了解，一批青年人逐步认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从而坚定地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

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1920年早春时节，中国南方山区分外湿冷，在浙江义乌一个叫“分水塘”的小山村里，两张长凳架起一块木板权当书桌。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一个面庞清瘦的青年时而停笔沉思，时而奋笔疾书，原来他正在全神贯注地翻译一本外文书。

他绞尽脑汁，斟酌再三，才终于写下了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母亲看着儿子那么辛苦地工作，非常心疼，弄来糯米包了几个粽子，还端来一碟红糖送到柴房，叮嘱儿子趁热吃。

过了一会儿，母亲进屋来问儿子：“红糖够不够，要不要我再给你添些？”儿子抬头答道：“够了，够甜了。”母亲看着儿子的脸，

惊讶地说：“你嘴上怎么全是墨啊？！”

儿子低头一看，这才发现桌上的红糖一点儿没动。母子相视大笑。原来，他只顾着埋头工作，竟全然不知是蘸着墨汁在吃粽子呢！

这个蘸墨汁吃粽子还连声说甜的青年就是时年 29 岁的陈望道。他专心致志翻译的册子名叫《共产党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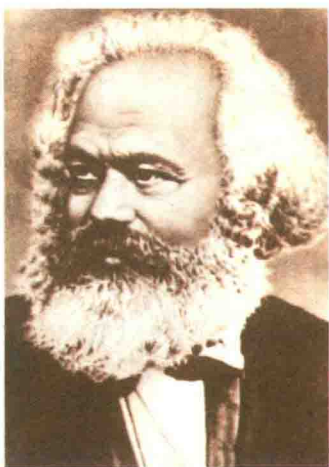
陈望道，原名陈参一，1891 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曾就读于义乌绣湖书院、金华中学、浙江之江大学。1915 年，他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成绩优异，收获丰硕。在日本期间，陈望道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望道返回祖国。那年 6 月，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授语文课，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反动当局责令校长将他革职查办，但这一命令遭到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反动当局随即出动警察包围学校，从而酿成了轰动全国的“一师风潮”。这一风潮得到全国声援，最终迫使反动当局收回成命。

陈望道在这次风潮的磨炼中受到教育，深刻认识到单纯对社会改良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



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



马克思（1818—1883），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



恩格斯（1820—1895），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

恰在此时，上海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正在为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中译本而着急和犯难。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人们迫切期待读到马克思的原著。由于大多数人不具备直接阅读外文原著的能力，因此翻译中文译本成了当务之急。另一方面，1920年以前的中国，几乎没有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开山之作，具有标志性和指导性，中文全译本就从这里启动。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回忆说：“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都翻不了。”陈独秀也感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

中文译本。

1920年初，当上海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将翻译《共产党宣言》全文提上日程并讨论人选时，《民国日报·觉悟》主编邵力子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因为陈望道留学日本期间阅读过进步学者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精通英文，国文素养也很好，而且在轰动全国的“一师风潮”中成为受到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所关注的风云人物。这项光荣的任务就这样落到了陈望道的肩上。

1920年早春，身在杭州的陈望道收到了上海《星期评论》杂志社发来的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邀约，感到既意外又兴奋。不久，他收到了翻译底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这时他因为支持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进步学生闹学潮，被迫离开学校，索性就带着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回到家乡。为了借助多种文本准确翻译，陈望道专门托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参照。

陈望道回家时已经临近春节。为了不被拜年的客人打扰，他冒着严寒躲进自家老屋旁的柴房里，废寝忘食地投入翻译工作，这才有了陈望道蘸墨汁吃粽子还连声说甜的一段佳话。

1920年4月《共产党宣言》翻译完成后，陈望道在家乡收到《星期评论》社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到上海任该刊的编辑。他喜出望外，立刻收拾行装出发了。

没有料到的是，他到上海没多久，《星期评论》就被北京政府

勒令停刊，准备连载《共产党宣言》也没法落实了。陈望道把译好的书稿拿给陈独秀，请他帮着校译。陈独秀非常欣赏陈望道深厚的语言功底，并意识到出版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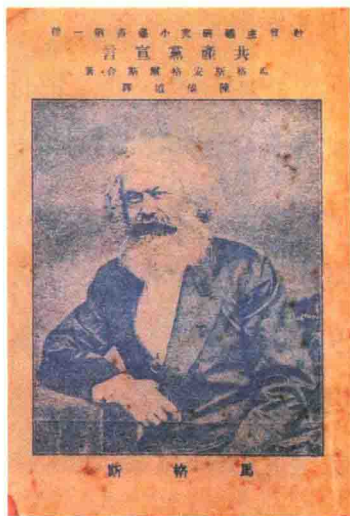
当年8月，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正式出版，并很快在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中风靡一时，第1版共印刷千余册，一面世便销售一空。

在此期间还有个小插曲——《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第1版比现在的32开本还小，小册子封面上印着满脸络腮胡子的马克思半身像，颜色是水红色；马克思像的上方印着“共产党宣言”5个大字，书名印倒了两个字的顺序。这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目前留存下来的只有两本，一本藏于浙江省温州市图书馆，一本藏于山东省广饶县博物馆。

同年9月，应读者要求，再版时封面上马克思像的颜色改为了蓝色。

有学者做过统计，到1926年，《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共印刷17次，累计数十万册，在北伐军中几乎人手一册。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之所以受到热烈欢迎，是因为当时中国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正在兴起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热潮，许多人希望从原著中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实要义。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正式出版时，“陈望道”这个名字也正式使用。他将“参一”改为“望道”，为的是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及热切期望中国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心情。正因如此，陈望道获得了“传播《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的美誉。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出版后，陈望道给鲁迅寄去了他的译作，鲁迅当天就饶有兴趣地读起来，并对家人说：“现在大家都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为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西行漫记》，书中载有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宣言》对其思想转变产生影响的自述。

随着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革命者接受，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中国社会在较短时间内出现了一个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群体。正是这批最早聚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先进分子，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

聚集在马克思主义 的旗帜下

有了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指引，中国先进分子的认识更清晰了，信念更坚定了，队伍更纯洁了。

1920年3月，李大钊等人经过多次酝酿讨论，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当时是秘密成立的，直到1921年11月17日才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对外公开。这个研究会成立的根本目的就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团结进步学生，培养先进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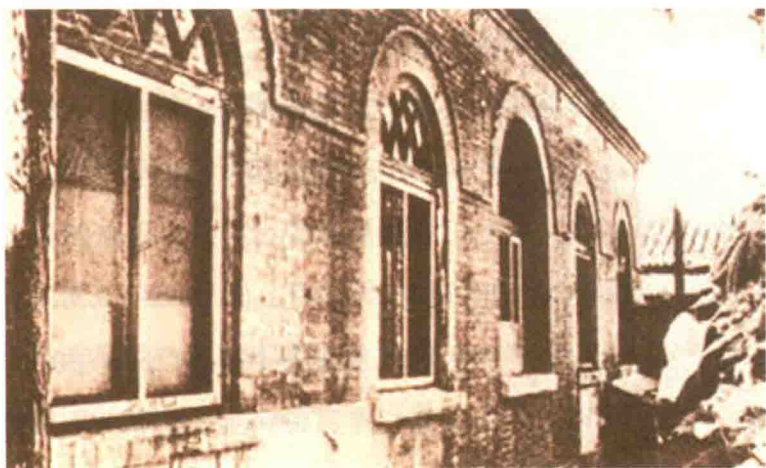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图为研究会部分成员合影。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没有活动场所，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拨出两间屋子给研究会使用，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图书室取名为“亢慕义斋”，不知内情者不解其意。其实，“亢慕义”为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当时北大宿舍称“斋”。“亢慕义斋”也即“共产主义室”。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广泛搜集和翻译马克思主义书籍，积极组织专题研究，举行讲演会、讨论会、辩论会等活动。通过这些有组织的学习宣传活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提高了会员和非会员的思想觉悟，加深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青年。

当时，邓中夏等青年学生每天一早就到北大三院阅读马克思主



五四运动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进步思想的主流。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图为该会的活动场所——“亢慕义斋”旧址。

义书籍，下午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晚上聚在一起讨论革命问题或交换学习心得，往往要到深夜12点钟后才就寝。

在天津，周恩来等人成立了一个宣传五四新思想的社团，取名“觉悟社”。1920年初，觉悟社成员参加了反日运动，周恩来在学生运动中被捕。最初，他和同学们被关押在警察厅的营务处，彼此不能见面、不能交谈。反动当局采取拖延的办法，既不将他们转交法庭公开“讯问”，又不释放，一直拖了两个多月。

4月2日，周恩来和难友们经过秘密联络，决定发动绝食斗争。在学生们的强烈要求和学校师生及律师的交涉下，反动当局迫于压力，将被捕学生移送地方检察厅。在这里，被拘留的学生们条件得到一些改善：除女代表两人外，大家可以同住一处，自由往来，并且能够阅读书报。这样，他们就共同议定：每天早晨做体操，晚上举行全体会议，并且推举周恩来等人主办读书团；每星期一、三、五举行演讲会，介绍各种新思潮。

于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学习活动开始了。他们把监狱当作学习革命理论的课堂，周恩来分5次向大家介绍了马克思学说。在当时，能这样系统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不多。

在上海，为加强对外宣传和指导学习，从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八卷一号起，《新青年》杂志被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从此，《新青年》开始以丰富的内容、崭新的面貌公开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明确地提出改造中国的政治主张。

1920年11月7日，恰逢十月革命纪念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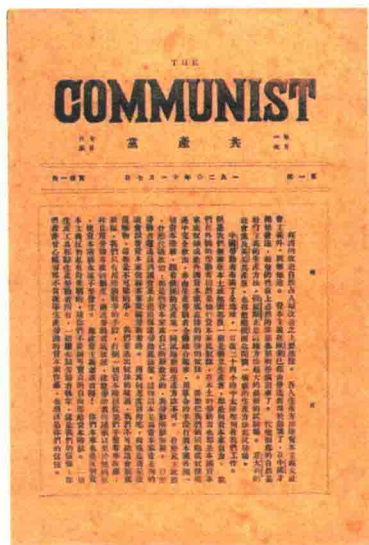
织又创办了半公开的、政治性很强的《共产党》理论月刊，着重刊登马克思、列宁重要著作的片段或节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有关共产党的知识、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情况，受到共产主义拥护者的广泛好评。

这份公开打出了“共产党”旗号的新刊物，发行量达5000份之多，并通过各种渠道散播向全国，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长沙，毛泽东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寻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入手，以新民学会为平台，先后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1920年秋，新民学会已经拥有100多名会员，成为一个有相当社会影响的进步团体。

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在长沙召开新年大会。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是选择主义，经过讨论并付诸表决，赞成布尔什维主义的有12人，赞成民主主义的有2人，赞成罗素主义的有1人，主义未定者有3人。由此可见，新民学会中大部分成员已经做出正确的选择，聚集在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

马克思主义一旦为革命者所接受，就显示出了强大的精神威力。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国内除上海、北京、长沙外，武汉、济南、广州等



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



1920年11月，毛泽东、何叔衡等秘密组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图为油画《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周树桥画）。

地都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国外，旅法、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也相继成立。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积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大地得到广泛传播、落地生根，而且在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中培养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中国革命就有了正确方向，有了胜利的希望。这也意味着经过挫折与失败、争论与选择，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

名言金句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习近平

读党史 长智慧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理想信念具有指引人生奋斗目标的作用。确立什么理想，决定着有什么样的初心。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的远大理想。

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才能够赢得人民，赢得时代，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才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力量。

坚定的理想信念对于青少年朋友同样十分重要。因为你们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没有理想信念，同样会导致精神上“缺钙”。你们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努力学习，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五、中国怎样吹响创建共产党的集结号？



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创建共产党是怎样一件石破天惊的新鲜事，借用时下流行的语言，就是很“酷”、很“潮”。

说它很“酷”，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颠覆了传统的政党观念。中国长期实行封建专制统治，严禁结党营私和搞宗派主义，有“君子群而不党”之说。因此，当时社会上早期成立的政治团体在名称上大都避开“党”字，大多称为“会”“社”。比如，孙中山于 1905 年组织成立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就叫“中国同盟会”，梁启超于 1907 年发起成立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改良派团体就叫“政闻社”。

直到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随着议会活动的出现，中国才逐步确立了近代政党观念。

说它很“潮”，是因为共产主义对于当时的中国乃至当时的世界，也是一个新鲜事物。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图为列宁宣布苏维埃政权成立（弗·阿·谢罗夫 画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家。仅仅4年后，刚刚摆脱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正在尝试资本主义议会政治的中国，就已经着手创建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这在当时是一个多么大胆而可贵的尝试啊！

一辆神秘骡车 引出一段党史佳话

1920年2月的一个夜晚，从北京朝阳门驶出一辆旧式带篷骡车，正在通往天津的土路上缓缓行进。

在这辆北方最为常见的两轮骡车上，共有两个人。坐在车篷里的一位，40岁左右模样，长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头上低低地压着一顶毡帽，看上去像是个土财主；驾辕的一位，年纪稍小一些，身材魁梧，随身携带一个手提包，像是装着满满的账本，看上去俨然是一个年前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

两个人一边赶路，一边交谈。

“仲甫，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苏俄式的政党？”

“好啊。我以前是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的。倘若那个时候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我是不干的。现在该考虑了。”

被称为“仲甫”的人，便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和他说话的，是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和陈独秀不但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而且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性人物。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社会上就有“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的说法，还流传着一首嵌名诗盛赞两人：

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

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按理说，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名宿出行，应该是西装革履、光明正大的。但是，他们这次出行却为何要这样乔装打扮、有意隐瞒身份呢？

原来事出有因。

1919 年 6 月初，五四运动进入高潮阶段，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提出包括取消北京政府丧权辱国的对日签约和免除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等卖国贼官职等 5 项要求。

陈独秀外出散发宣言传单时，被北京政府的警察拘捕入狱。消息一传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学生等纷纷开展营救活动，甚至孙中山都亲自打电报给北京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在关押陈独秀 3 个月后，同意他以治病为由保释出狱，但规定不得擅自离开北京，不得从事政治活动，由警察厅监管。

转眼到了第二年，陈独秀以为外面已经风平浪静，便悄悄离京到上海、武汉讲学，宣扬打破旧制度、彻底改造社会的政治主张。他的演讲很受欢迎，国内各大报纸都争相摘要登载。很快，消息经

报纸传到北京。

不久，陈独秀乘车返回北京。刚到寓所不久，便有人前来敲门。原来是个警察。

“陈独秀先生在家吗？”警察问他。

“在家，在家。我就是陈独秀。”

那个警察大吃一惊。他说：“一些报纸刚刚报道您昨天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所以警察局派我来看看您是否在家中。”

陈独秀说：“我是在家中呀！”

那个警察说：“陈先生，您是刚被保释出狱的。按照法律规定，如离开北京，您至少要向警察说一声才是！”

“我知道！我知道！”陈独秀说。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名片呢？”

陈独秀递了一张名片给他，警察放在口袋里，又闲扯了几句，匆忙走了。

警察一走，陈独秀警觉起来：他前脚进门，警察后脚进来，这确实太过于蹊跷了。他越想越不对头，立即带上随身物品去李大钊家商量对策。李大钊也觉得形势紧迫，建议陈独秀立即转移到环境宽松一些的上海去。

但是，当时北京的汽车站、火车站都有密探，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自告奋勇，决定亲自化装护送陈独秀出北京，然后转道天津，再乘船去上海。于是，才有了两人夜里乘坐骡车出京的一幕。

从北京去天津的途中，两人热烈地谈论着在中国建党事宜，并

约定李大钊在北京、陈独秀在上海，一北一南负责建党。

3天后，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响，客轮载着陈独秀驶向了上海。

这由此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历史就是这么机缘巧合，又充满戏剧性悖论：北京政府本想通过逮捕陈独秀来禁锢进步思想，反倒使陈独秀一时声名远播，成为人人皆知的五四运动领袖人物，新思想的社会影响也更大了；北京政府本想通过关押、监视来迫使陈独秀放弃革命主张，不再参与领导学生运动，却反倒使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分子进一步看清了其真面目，深感中国有必要建立一个新型政党，以彻底推翻旧制度和旧势力。

由此，李大钊、陈独秀将目光从以青年学生为主体转向以工农大众为主体，将行动从对思想文化的研究传播转向组织建党的实际运动。

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

从北大红楼到上海 石库门：点燃建党火种

1920年2月19日，正是“新桃换旧符”的除夕，陈独秀悄然来到上海。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一座拥有约230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城市。时逢新春佳节，街头到处响着鞭炮声，酒吧、饭馆里传出



维经斯基（1893—1953），
共产国际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

划拳声，舞厅、戏院飘出乐曲声，一切似乎和往年春节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这里即将成为红色中国的起点。

一天晚上，陈独秀正在书房为《新青年》奋笔疾书，突然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打开门，一位中等身材、体格强健的俄国青年出现在面前。

这位俄国青年中文名叫“吴廷康”，公开身份是一名新闻记者，实际上是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他来华的使命就是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与革命者建立联系。

其实，维经斯基到达中国的第一站是北京。他首先拜会了李大钊，两人见面交谈很是默契，维经斯基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意愿与李大钊、陈独秀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中国以哪里为中心开展建党活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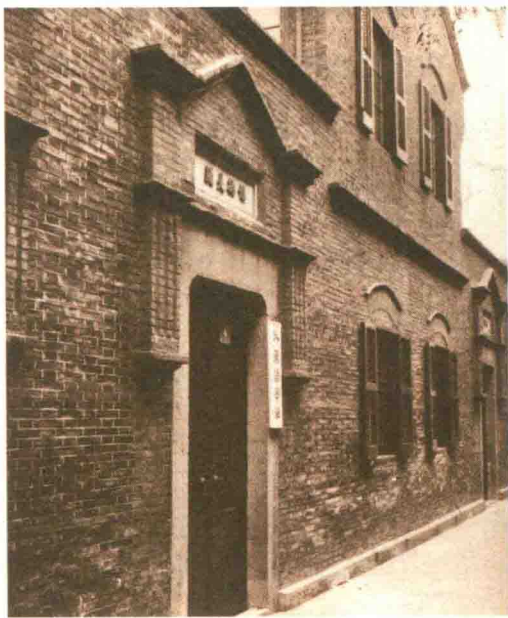
李大钊向维经斯基介绍说：北京是当时北洋军阀盘踞的反动堡垒，没有很发达的工业，工人运动尚处在初级阶段；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可以开展工人运动，特别是从北京去上海的陈独秀团结了一批倾向共产主义的先进分子，有更好地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所以，他建议维经斯基到上海找陈独秀，进一步商谈在中国创建党组织的问题。

带着李大钊的亲笔信函，维经斯基来到上海。维经斯基的到来，使陈独秀喜出望外。两人交换意见后一致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必须加快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步伐。

为协调和联络各革命社团，1920年5月，陈独秀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此为基础成立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

此后不久，围绕着究竟是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1920年8月，经过一番酝酿，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被推举为首任书记。这是中国大地上第一个以苏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组织，是全国建党活动的中心，在筹备建党的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后来其他大部分地区党组织的建立，都与上海有直接的联系，有的直接



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图为该组织为输送青年赴苏俄学习而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旧址。

就是上海党员到外地去帮助创建的。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互通情况、交换意见。在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后，陈独秀即建议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并负责北方的建党工作。陈独秀则在南方直接指导了广州、长沙、武汉等地的建党工作。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李大钊主持党小组全面工作，并每月从个人薪俸中捐出80元作为活动经费。1921年1月，党组织举行全体会议，决定将组织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并推举李大钊为书记。

在那茫茫黑夜里，建党的火种尽管还很微弱，但一旦点燃，便迅速得到了许多地方响应，熊熊燃烧起来。

董必武和李汉俊等在武汉、毛泽东和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和谭植棠等在广州纷纷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建党活动不仅在国内先后展开，在国外，从近邻日本到遥远的欧洲，建党的火把也相继燃起。施存统、周佛海在东京成立旅日留学生党组织，留学法国的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旅法留学生中成立党组织。

马克思主义——这个源于遥远国度的学说就这样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

一条小船

诞生一个大党

有些事情、有些日子，在梦想开始、创业起步的时候并不起眼，但随着时间之风荡尽黄沙，岁月就会掀开面纱，展示出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誕生日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只是这个日子即使那些亲身经过的人也难以准确地记住它。

1941年，中共中央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确定把1921年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

直到1979年，党史专家才考证清楚，找到了红船启航、初心确立的原点。

1921年7月23日，上海的盛夏，天气酷热。傍晚时分，身着长衫、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外景



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召开。
图为油画《启航——中共一大会议》（何红舟 黄发祥 画 中国美术馆藏）。



中山装、西装等不同服装的 10 多个有志之士，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憧憬，从四面八方赶到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现为兴业路 76 号）的一个幽静小院。

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 13 名代表出席大会。这些代表是：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留学生代表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

这 13 名代表，代表着全国 50 多名党员，其身份大多是编辑、记者、学生或教师，平均年龄为 28 岁，正巧是毛泽东当年的岁数。

此外，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兼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李大钊、陈独秀这两位党的创始人因有事情要处理而没能参会，这在党史上留下了一个遗憾。

23 日晚的会议开幕式上，共产国际代

表马林、尼克尔斯基热情致辞。随后几天，会议按照计划进行，先由各地代表报告党团组织状况并作交流，然后起草和讨论党的纲领和今后的工作计划。

30日晚，会议尚未开始，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并四处张望。这引起了大家的警觉，有人当即质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含糊地回答“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接着又说“对不起，找错了地方”。说完，他就匆忙退了出去。

此处附近确实有个社联，但并没有设主席，也没有姓王的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着丰富的秘密工作经历。他当机立断地说：“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离开会场不到1刻钟，法租界巡捕房就来搜查盘问，但除了查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惊险的是，室内桌子抽屉里就放着一张党纲草案，只是因为涂改混乱、字迹不清，才没有引起他们注意。

虽然有惊无险，但会议不能再在上海举行了，必须换地方。有人提议去杭州，但代表们认为杭州虽好，却太惹人注目。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我老家嘉兴有个南湖，不像杭州那样人多热闹，离上海也更近，往返方便，容易隐蔽。在那儿我们可以租船扮作游客，在船上开会既安全又方便。”大家都觉得这个安排比较妥当，当即同意。

就这样，王会悟作为会务工作人员，成为在南湖游船上列席中共一大的唯一女成员。

为了缩小目标以免引人注目，代表们于8月初分成两批乘车南行，各自买票分散在不同车厢，相互之间装作不认识。

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因为是外国人，太惹眼，所以没有去嘉兴参会。

陈公博由于密探闯会场受了虚惊，加上他所住的大东旅社发生了枪击杀人案件，一夜之间两起突发事件吓得他不敢再在上海停留，嘉兴的会也没去参加。

为了安全起见，代表们带着乐器和麻将牌，并在中舱的桌上备有酒菜，以游山玩水作为掩护。王会悟还扮成歌女模样，坐在船头遥望，充当会议的“哨兵”。

上午11时许，中共一大闭幕会议在南湖画舫上开始了。代表们讨



小小红船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图为嘉兴南湖“红船”的复制品。

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下午，南湖天气开始转晴，湖面上却突然传来“突突突”的响声，一艘快艇向着画舫驶来。

会不会是警察局的汽艇？代表们经过上海的一场虚惊，警惕性提高了，赶紧收起文件，“哗啦哗啦”搓起麻将来。“突突”声由远及近，汽艇从画舫一侧一掠而过，并没有来找麻烦。后经打听，原来是嘉兴城里一个大户人家给孩子做满月，大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最后，会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李达分管宣传工作。

下午6时左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闭幕。

“让我们再喊一遍口号吧！记得声音要轻一点儿。”

代表们一齐轻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呼喊声低沉却有力，至今仍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回响。

这条小船由此成为承载千钧的“红船”，见证了近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

名言金句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毛泽东

读党史 长智慧

之所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因为在中国近代这个政治大舞台上，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力量都曾出场过、表现过，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无论是民族独立，还是人民解放，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

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时虽然人数不多，又只能秘密活动，但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就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毅然决然地担负起民族复兴的艰巨使命。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重托、历史的必然，是开天辟地的伟大壮举。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伟大征程，也标示了中国梦的起点。

青少年朋友，你们身上寄托着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青少年朋友，希望你们能深入了解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光荣历史和辉煌历程，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必然性及其伟大意义。近代历史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因此，爱国就要爱党，就要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努力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六、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不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又很难回答。

在鸦片战争后的80年间，中国没有一个政党公开宣布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至于谁是朋友的问题，中共一大会议上，代表们针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是敌人还是朋友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最后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对其他政党明确表示了排斥和不合作的态度。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中国有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意思是说，志向不同的人，就无法共事。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走什么革命道路的问题。

近代中国由一个封建专制帝国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具有特殊国情的东方大国，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又有别于封建社会，原有的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依然存在，又增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挫折一再说明：在中国这样的特殊国情下，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是以往中国革命不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残酷的现实说明：中国革命不能照搬照抄别人的现成模式，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创新。

远东会议：

走出国门得新知

中国共产党在立足国情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时，并没有封闭自己，而是以开阔的眼界、开放的思维积极走出去，学习别人的，思考自己的。

1922年初，在冰雪严寒中，一列载着中国、朝鲜、蒙古、日本4国178名代表的火车缓缓驶入人流如潮的莫斯科火车站。站台前早已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激昂嘹亮的《国际歌》乐曲、迎风飘扬的彩旗、一张张热情洋溢的笑脸……这绚丽的国际主义画面感染着前来参会的每一位代表。

在巍峨庄严的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

大会主席台正中上方是马克思的半身塑像，会场四周还有用中、朝、蒙、日等文字书写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解放东方劳动者！”等巨幅横联，会场内外洋溢着远东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热烈气氛。

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由44人组成，其中包括共产党员14人，还有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国民党代表及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团体的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出代表参加大型国际会议，标志着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远东”是欧美人使用的地理概念。他们以欧洲为中心，把东南欧、非洲东北称为“近东”，把西亚附近称为“中东”，把更远

的东方称为“远东”。“远东”一般指今天的东亚、东南亚和南亚。

之所以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也就是由美国发起、英国支持，于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召开的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九国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幌子，签署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肯定了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

所谓“机会均等”，是指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都应得到同样的好处。

所谓“门户开放”，是指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能关闭它在中国所控制地区的门户而不让其他国家进来。

这是帝国主义列强联手对中国实行的赤裸裸的控制压迫。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

列宁原来将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欧洲，但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统治力量强大而难以实现。十月革命后，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迅速高涨，列宁转而把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于远东。

为了对抗九国华盛顿会议瓜分远东的罪恶行径，共产国际决定针锋相对地召开远东民族会议。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的伟大号召。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是列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思想后做出的著名论断。

这次会议在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指出：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目前的革命任务，就是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解决民族压迫和封建束缚这两大根本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创立一个简单联邦式的民主主义共和国”。

大会结束后，中国代表怀着巨大的热情和兴趣，到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城市进行参观访问，近距离地认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

在十月革命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斯摩尔尼宫，在革命时代的莫斯科地下工作纪念地，在充满活力的城市街头，中国代表深切地感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政治热情和远大理想，感受到了革命胜利的巨大喜悦和民族自豪感。这一切都给予他们很大的鼓舞和启示。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受到共产国际的有力指导，坚定了理想信念，

激发了前进动力。这次会议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纲领，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时局主张：

认清现阶段革命对象

20 世纪 20 年代初，国内政局不断发生变化，各派军阀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扩大。

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每个军阀背后都有帝国主义做后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争夺从过去的直接冲突转变为通过支持各自支持的代理人——中国军阀的内战来实现。因此，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中国斗争的加剧，必然导致中国军阀之间矛盾的激化。

袁世凯死后，北京中央政权一直被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皖系军阀操纵。1920 年，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发动直皖战争，打败皖系军阀主力，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日本为了夺回控制权，极力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夺取和掌握中央政权。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失败，被迫退回关外。

从此，直系军阀独占北京中央政权，几乎控制了华北和华中的全部省份，并野心勃勃地要把势力向南方扩张。中国政局陷于内争迭起、战乱绵延的境地。

军阀之间的争夺和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国家财力消耗巨大，人民生活愈加艰辛，战火所到之地更是民不聊生。

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纷纷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张。

“武力统一”是控制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的主张，目的是借统一之名，吞并其他军阀势力。

“联省自治”是地方军阀和政客的主张，目的是打着保境安民的招牌，维护自身利益，对抗中央军阀的武力统一。

“好人政府”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梁漱溟、王宠惠等人的主张，他们认为只要由国内的优秀分子出来组织一个好人政府，中国就能得救。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下，所谓无党无派的“好人”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入阁，并以王宠惠为国务总理，组织所谓的“好人政府”，而实权仍掌握在直系军阀手中。这个军阀捞取政治名声的傀儡政府并没有做出什么实际的好事来，仅仅存在了3个多月就宣布解散了。

孙中山虽然仍坚持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却提不出足以动员群众奋起斗争的革命纲领。他领导的维护临时约法、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护法运动”，也因陈炯明的公开叛变而失败了。

中国该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许多仁人志士为此而苦恼、彷徨和忧虑。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机关报《劳动周刊》，并在北京、武汉、湖南、广东等设立地区分部。各分部纷纷开设工人夜校，创办工人刊物，组织产业工会，开展罢工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

罢工为起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中国革命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

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上海的党员建议中央尽快发表一个对时局的声明，以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于是，大家推举陈独秀起草了文件，经中央局讨论修改后通过，并派专人送往北京征求了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的意见，最终文件得到一致赞同。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起点。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派因“屡次与封建的旧势力妥协”，革命的果实落到了封建军阀的手中，而“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使得中国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成为“半独立的封建国家”。因此，挽救中国时局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拟定了摆脱国内困境的正确方案，受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高度关注，引起了强烈反响，使国人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与当时其他党派形形色色的政治主张相比，敢为人先，独树一帜。在当时军阀高压统治、帝国主义强权横

行的社会现实下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需要巨大的革命勇气的。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对于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久的中国人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

反帝反封建: 找准革命的方向

1922年夏,12位行色匆匆又满怀激情的知识分子或商人打扮的人冒着酷暑高温,陆陆续续来到了位于上海英国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的李达的寓所。

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楼上是书房和寝室,楼下是小客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就在楼下的小客堂里召开。

此时,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密探们正在大上海的街巷里弄中四处游荡,嗅着令人压抑烦闷的空气,试图找出共产主义这个“洪水猛兽”活动的蛛丝马迹。然而,令他们倍感沮丧的是,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党的二大正在秘



中共二大会址之一——上海南成都路
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

密召开，他们却无从知晓。

1922年7月16—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中共中央提名或协商确定的。除上届中央局成员外，参加大会的还有到莫斯科参加远东民族会议后回国的党员代表、各省区党组织的代表，共计12名，代表全国195名党员。

吸取党的一大遭到法国巡捕袭扰的教训，党的二大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保密措施，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而且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因此，这次大会在8天时间里只召开了3次全体会议，而且更换了3个地点。

这样做，保密的目的是达到了，但也造成了一些历史遗憾。

毛泽东后来在陕北的窑洞里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党的二大的核心议题和重要贡献在于提出和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集中地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这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里。

宣言告诉那些心存幻想的人：“帝国主义者还口口声声唱什么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人类平等好听的名词……但是中国人民受了这九十年被压迫的经验，却最易了解帝国主义者所宣称的平等和自决是什么意思。而且也容易了解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

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其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实行共产主义。但是，依据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进行民主革命，即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军阀统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这一重大理论的提出，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矛盾，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指出了唯一正确的斗争方向。

犹如阴霾里的一声春雷，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仅1周年之际，就以其先进的思想理论和敢为人先的政治勇气，立足中国国情，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一举扫除了人们思想上的迷惘，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名言金句

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是人们用以判断这个政党的活动性质与水平的界碑。

——马克思

读党史 长智慧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党人就抱着为推翻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信念，立即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如果不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

制定革命纲领，必须站在正确分析国情的基础上。建党初期，对国情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从党的一大确定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到党的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创新成果，标志着党已经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历史事实说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真实反映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正确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特点，

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指引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正如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分析国情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革命纲领一样，青少年朋友也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对未来有清晰的判断，要在学习中不断增强鉴别力，不要在随大流中失去自己的主张和独立性，努力争做有主见、有思想、有责任感的一代新人。

七、共产党为什么要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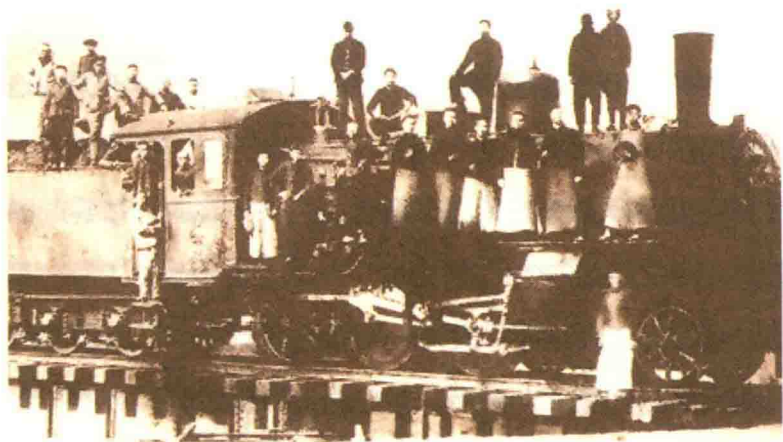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而诞生的革命政党。

西方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同时，在列强操纵下，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局面日趋严重。中国社会面临内忧外患、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国人民面对沉重的苛捐杂税已经难以承受，人们强烈呼唤着一场能够改变现状的大革命。

此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虽然已在中国南方建立了一块革命根据地，欲从广东北伐，实现国家统一，却陷入了内部分裂、组织涣散、日趋腐败的状态。孙中山深感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辙。

此时，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不久，仍处于秘密状态，虽然很快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农民运动也初步开展，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二七惨案的发生，致使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从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如果仅仅依靠工人阶级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

的孤军奋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此时，列宁领导的苏联把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于远东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并基于其地缘政治利益，愿意支援中国革命。

这3个方面的因素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国共第一次合作从酝酿到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从反对合作到同意合作、从主张党外联合到接受党内合作的过程。

与谁合作：

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中国共产党最早讨论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是在成立之初。

1921年7月，在党的一大上，代表们就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由于那时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对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曲折性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最早提出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个荷兰共产党人。

1921年12月，马林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张太雷的陪同下，从上海出发，途经湖北、湖南，开启华南访问之行，访问过程中与孙中山、陈炯明、吴佩孚分别进行了多次会谈。

马林认为：孙中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合的松散组织，比较容易在其内部促成重视群众运动的思想，甚至有可能推行共产党的主张，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陈炯明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是合作对象；吴佩孚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不会加入中国革命运动。因此，在中国开展民族民主运动与共产党合作的，不是陈炯明，也不是吴佩孚，而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



马林（1883—1942），共产国际代表。

马林遵照列宁和共产国际指示，并依据他在印尼取得的成功经验，主张共产党人应该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下到国民党中去宣传革命思想，通过国民党组织接近和联系群众，和国民党人一起开展反帝斗争。

然而，这一建议遭到陈独秀及党内大多数人的反对。

陈独秀认为国民党不重视民众发动，而企图依靠军阀进行联甲倒乙、联丙倒甲的军事冒险，批评孙中山“想把艰难的革命事业黏附在利用南北军阀冲突的机会上面”；他只钦佩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而认为国民党“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国民党人是一帮贪生怕死之徒，绝对干不了革命，“把这班政客烧成了灰，用五千倍的显微镜，也寻不出一粒为国为民的分子来”。因此，1922年4月，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明确表示反对与国

民党联合。

不久，参加远东民族会议的中共代表回国。

原来，列宁因病未能出席这次大会，但却始终关心着大会的进行。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

当他们3人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克里姆林宫列宁办公处的会客室时，列宁立即从隔壁的办公室走过来，和他们一一握手。在亲切的交谈中，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向列宁请教中国革命问题，列宁回答说，他对中国的情形了解很少，只知道孙中山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他转而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在得到“一定可以很好地合作”的回答后，他又问张国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是否可以合作，并希望张国焘告诉他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形。

张国焘表示：在中国民族和民主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而且可以密切合作；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列宁听后频频点头，表示满意。

列宁的亲切接见和对中国革命的宝贵指示，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革命纲领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推动中国国民党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革命道路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了解了列宁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联合的建议及共产国际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后，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有所改变。

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是“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

7月，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怎么合作：一个人可以 加入两个党吗？

是否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解决了，但关于怎样合作的问题又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二大上提出的“民主的联合战线”是以“党外合作”的方式建立。也就是说，国共两党在地位平等、各自独立的基础上合作推进革命。

在当时的国民党看来，国共两党力量对比悬殊。共产党是一个刚成立1年多、只有几百名党员、处于秘密活动状态的小党，而国民党则是建党28年、拥有几十万党员、辛亥革命后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大党。因此，国民党不可能与共产党实行“平起平坐”的党外合作，共产党员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

这样，国共两党一开始时在工作方式上就出现了分歧。

1922年8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认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

为了统一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认识，8月29—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重点讨论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7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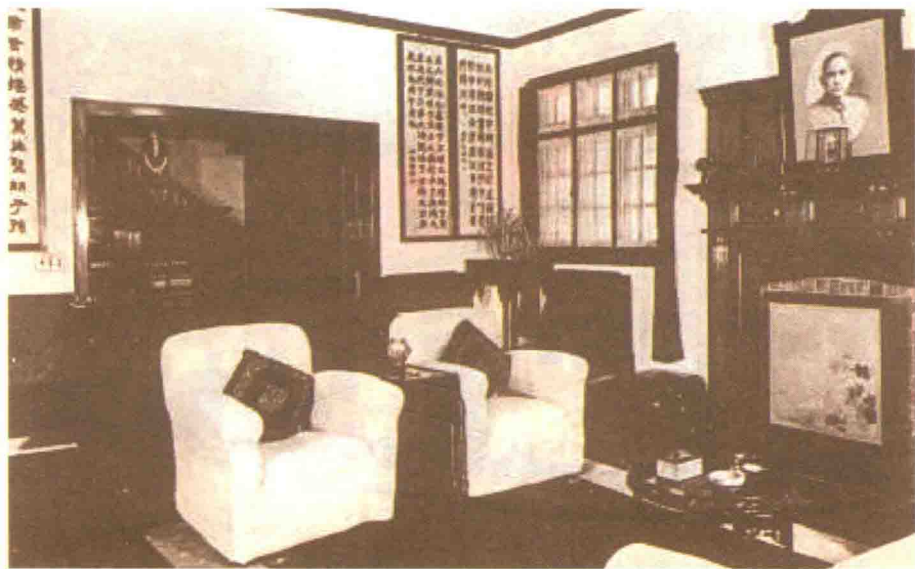
经过两天的激烈讨论，西湖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的提议。提议规定：国民党取消入党时打手模（按手印）和向孙中山本人宣誓等形式，国民党依据民主主义的原则进行改组，中国共产党员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实现两党“党内合作”。

不久，马林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告知共产党已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提议国民党进行改组。孙中山表示真诚欢迎国共合作，决定邀请共产党人帮助改组国民党。共产党也派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同孙中山及国民党其他领导人进行多次会晤，共商国共合作事宜。

当孙中山诚恳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李大钊说自己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成员，加入国民党可以，但不能脱去共产党籍。孙中山表示这不打紧，让李大钊尽管一面做共产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国民党帮助自己。

于是，李大钊由孙中山亲自主盟，以个人名义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为最早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与中国国民党的创建人历史性地



李大钊等在上海与孙中山会晤的地点：孙中山在上海的寓所——上海法租界莫利哀路（今香山路）29号

走到了一起，成了革命盟友。

1923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这就等于批准了“国共合作”，因为中国共产党那时隶属于共产国际，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问题。

在讨论过程中，代表们发生了激烈争论，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是以马林、陈独秀等为代表，认为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还提出革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种观点虽然有利于建立联合战线，但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广州市恤孤院后街31号（今恤孤院路3号）

不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

另一种意见是以张国焘、蔡和森等为代表，主张部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产业工人加入，强调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这种观点虽然强调了党的领导，但脱离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任务，势必导致共产党的孤立。

以上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又都存有片面性。

经过两天的激烈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正式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成民主革命联盟，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强调共产党要保持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这一策略是非常正确的，它不仅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公开或半公

开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壮大自身力量,同时也利于国民党本身的改造,使它重获新生。

在党的三大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一年毛泽东年届30,正当而立之年。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图为党的三大的决议案及宣言。

国共合作: 从改组国民党开始

宋庆龄曾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需要新血液。”

在孙中山看来,中国共产党就是新鲜血液。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屡遭挫折。在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以后,他又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都先后失败。就在孙中山苦闷彷徨的时候,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使他认识到:以往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幻想、在国内利用军阀力量以求中国统一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寻求新的力量,这就是对外联合苏俄,对内联合共产党。

从国民党内部状况看，党员的成分十分复杂，一批官僚政客和投机分子混进了国民党内，而一些早年追随孙中山的老党员也丧失了原来的革命精神，颓废消沉。正如孙中山所说：“民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党务反不如以前，几成了一盘散沙，把从前革命的精神都无形丧失了。”所以，中国国民党需要改造。

国共合作方针确定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派鲍罗廷来华，帮助孙中山加快改组国民党的步伐。

从1923年10月起，中国国民党的各项改组工作开始展开。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28日，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孙中山委任廖仲恺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9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委员们为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殚精竭虑。尤其是廖仲恺，每天工作长达十七八个小时。当他得知有些国民党老党员反对改组时，毅然表示：“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即击我杀我，亦在所不惜。”11月25日，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工作走出了成功的一步。

为了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并部署了参加改组工作的具体步骤。通告还要求各地党组织争取做到每省有一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的李大钊、湖南的毛泽东、山东的王尽美等都积极参加到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中。

经过较长时间的筹备，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并主持了会议。出席开幕式的代表有165人，其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任共产党党团书记，并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上做工作报告。

1月的广州虽潮湿寒冷，但广东高等师范礼堂里却春意浓浓，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会场内外悬挂着国民党党旗，会场内正面墙上高挂着孙中山肖像。礼堂中央设各地代表席，楼上正厅和两侧是外宾、各机关长官旁听席以及新闻记者座席。整个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

孙中山在致大会开幕词时说：“今天在此开中国国民党全国大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市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图为孙中山与代表们步出会场。

会，这是本党自有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一次！”孙中山还明确指出，要把以前的革命精神恢复起来，做好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的问题，第二件是改造国家的问题。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包括李大钊、毛泽东在内的一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国共合作为政治基础的国民革命运动开始走向高潮。图为中国画《国共合作——1924·广州》（赵建成 画 中国美术馆藏）。

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使国共合作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

25日上午，正当大会正常进行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列宁逝世的消息。孙中山立即中断了大会原定议程，并发表了纪念列宁逝世



演说。为了悼念列宁逝世，大会作出决定：电唁苏联致哀；休会3天，以志哀悼；广州各机关下半旗3日。

大会最后选举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

在国民党一大上，毛泽东的表现受到了孙中山的赏识和肯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毛泽东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他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党员重新登记，所有党员都要经过审查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

名言金句

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

——宋庆龄

读党史 长智慧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敌对势力异常强大，共产党人孤军奋战是很难战胜敌人的。因此，国共合作在当时是必要的、正确的，不能因为后来的分裂而否定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从秘密状态转向公开活动的起点，使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时，党员仅有420人。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党员以合法的身份深入工农群众中，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广泛开展工农运动，从而扩大了影响。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时，党员总数已达到57000多名，比三大时增加了100多倍。

第一次国共合作，使得“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有了答案。

国共合作的建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大革命运动，使中国近代历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难折断。”青少年朋友，张扬个性、特立独行固然无可厚非，但你们也要明白“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特别是当遇到成长中的重大问题和严重困难时，更要懂得交流，善于合作，团结身边人，齐心渡难关。只有这样，人生的步子才能走得更加稳健，才能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八、大革命为什么会风起云涌？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924—192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其声势之浩大、群众基础之广泛，在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人们通常将这次革命运动称为“大革命”。

在辛亥革命失败、军阀割据混战的黑暗统治中，大革命为什么能够在此时风起云涌、掀起高潮呢？

当时唱遍大江南北、红极一时的两首革命歌曲简洁有力地给出了答案。

一首是《国民革命歌》，它的旋律与著名童谣《两只老虎》相同，歌中唱道：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

.....

一首是《工农兵联合起来》，歌中唱道：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消灭敌人！

我们勇敢，我们奋斗，我们团结，我们前进，

.....

这两首歌曲生动地说明：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军阀，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中国革命

的依靠力量是工农兵等各方革命力量的大联合。

思路决定出路。

辛亥革命失败后沉寂多年没有找到出路的中国国民党，借助统一战线，抛弃了对旧军阀的妥协与幻想，开始联合社会底层民众，由此走上了新生的道路。

刚刚建党不久、力量 and 影响力还很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借助统一战线，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威信不断提高，由此公开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使中国各种革命力量实现了大团结，使工农运动和全国革命运动日趋高涨，从而迎来了新的革命高潮。

一起惨案引爆反帝高潮

在历史发展的某些时刻，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却会引发震惊中外的大事件，一个小小的斗争火种有时也会点燃熊熊的革命烈焰。

顾正红，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引燃了斗争火种，震惊中外。

顾正红幼时家境贫寒，16岁随母亲逃荒至上海谋生，后来在日本商人开办的棉纱厂当工人。他到中共地下组织开办的补习学校学习，并参加了工会纠察队，因在与日本资本家的斗争中表现积极，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20 世纪初叶的上海，日本人、英国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开设了很多工厂，在那里中国工人每天工作 12 小时以上，还经常遭受毒打、被扣发工资和罚款，甚至被随意开除。

1925 年 5 月，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为了扼杀工人罢工，故意开除工人积极分子，并以关闭工厂、断绝工人生活来源相威胁。



顾正红（1905—1925），
中国共产党党员，工人阶级先
锋战士。

15 日，当夜班工人陆续来到工厂门口时，漆黑的铁门却紧紧关闭着。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他在工人队伍的最前头领头高呼：“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

事先早有准备的日本人勾结租界巡捕房，手持铁棍殴打工人。顾正红带领工人拿起打梭棒自卫，并冲在最前面。七厂大班（相当于厂长）日本人川村等早已注意到顾正红，此时见他带头向前冲，便立即对准他开了枪，子弹打中顾正红的左腿，鲜血淋漓。顾正红忍痛高喊：“工友们，大家团结斗争啊！”敌人再次开枪，一发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他紧紧地抓住身旁一棵小树，鲜血染红了树干，但他顽强地挺立着，继续号召工人们往前冲。刽子手又向他连开两枪，并用刀向他猛砍。他最终身中 4 弹，身上的刀痕有 10 多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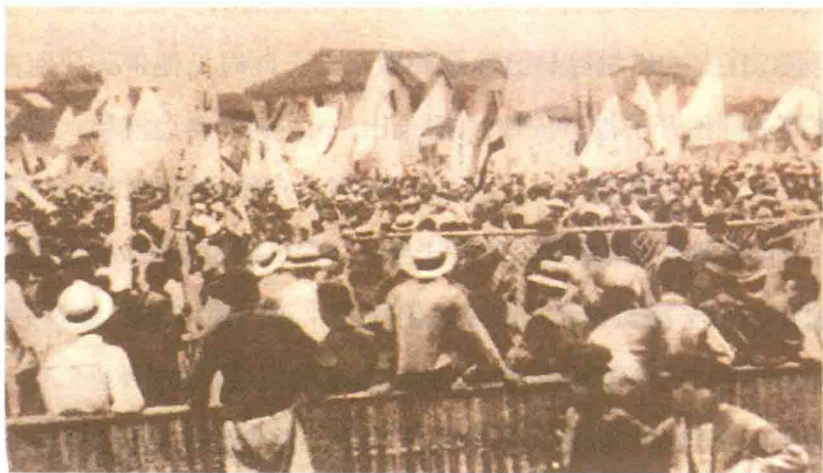
顾正红，这位年仅 20 岁的共产党员，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屠杀事件激起上海内外棉各厂工人的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工人们当天举行了大罢工，罢工浪潮迅速席卷上海社会各界。

5月30日，上海学生、工人3000多人分别到公共租界进行宣传、演讲和示威游行，散发写有“打倒帝国主义！”“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标语的传单。公共租界老闸捕房英国捕头拘捕了100多人，更加激怒了广大民众，数千人奔赴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群众。下午3时多，英国捕头竟下令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打死13人，其中包括学生3人、工人9人、商人1人，还有数十人受伤。上海南京路顿时一片腥风血雨。这就是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

中国各界人民长期郁积的对帝国主义分子的仇恨，经过五卅惨案的触动，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

五卅惨案发生当夜，中共中央举行紧急会议，成立了由瞿秋白、



1925年5月30日，上海市各界举行反帝示威游行。

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斗争，组织全上海的罢工、罢市、罢课活动。

6月1日，中共中央成立上海总工会，李立三任委员长。接着，总工会出面联络社会各界，成立工商学联合会。

6月1—10日，帝国主义者又多次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英、美、意、法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部上岸，占领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但是，上海人民并不畏惧，相继有20多万工人罢工、5万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全体商人罢市，连租界当局雇佣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宣布罢岗。

6月5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中提出斗争的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运动的狂潮迅速席卷全国。

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民众成千上万地涌上街头，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仅广州、北京、长沙、南昌、武汉、南京、杭州、济南、天津、开封、西安等重要城市，参加的就有300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直接参加运动的约有1700万人，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

五卅运动的国际影响也很大，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莫斯科举行了5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并为中国工人募



1925年6月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
图为罢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

捐。五卅运动期间，德国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暴行，支援中国”大会。美国工团联合上书总统，建议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废除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分散在近100个国家或地区的华侨也相继举行集会并发起募捐，给五卅运动以有力的精神和物质支持。

五卅运动持续了3个多月，是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和屠杀的伟大斗争。

从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整体来看，五卅运动只是一个序幕。序幕不是全剧，更不是高潮。在国共合作进行大革命的3年中，各种类型的革命斗争遍及大江南北，此起彼伏，蔚为壮观，汇聚成全国性的革命风暴。

战将辈出的神奇军校

国共合作的实现，为革命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活力。革命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

军队。为建立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创办了黄埔军校。

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是“革命者来”。

黄埔军校由孙中山亲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周恩来曾任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长，加伦等苏联军官为军事顾问。

苏联政府对黄埔军校给予了大力支持，资助现金 200 万卢布，运来 8000 支步枪和 200 万发子弹等军需物资，并派遣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军事教官。

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聂荣臻等担任政治教官和各级领导工作，还动员组织了一批党员、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军校，仅第一期学生中就有陈赓、左权、徐向前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五六十人，约占黄埔一期学生总数的 1/10。

黄埔军校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这是它区别于旧式军校的主要特点，而且主要由共产党人担任教学工作，政治教育卓有成效。

“铁军”是怎样 炼成的？

随着大革命发展的需要和黄埔军校提供的人才支持，建立统一的革命军队一事被提上日程。1925 年 7 月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和所掌握的武装力量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到年底，编成 6 个军，共 8.5 万人，成为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军队。

国民革命军借鉴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设立党代表和政治

部。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等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四、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当时各军党代表由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汪精卫兼任，副党代表实际负责军中的政治工作。

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标志着革命力量的重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革命事业尤其是后来北伐战争的进程。

至1927年春夏之际国共彻底决裂时，黄埔军校及其各地的分校共培养出1万多名学生，其中有2000余名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或共产党武装的参加者。这些人成了中国共产党最早进行武装斗争的种子。

北伐，统一中国，这是孙中山建立南方政府后的迫切愿望。

中国自清帝退位后，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状态。

1917年，孙中山到广州建立护法政府并提出北伐，可是他自己没有可信赖的嫡系部队，主要是利用两广军阀。当时的军阀认定“有奶便是娘”，像陈炯明那样的广东军阀在孙中山和北洋军阀之间摇摆不定，唯利是图。

孙中山极度失望，联合苏俄并吸收共产党人参加进来一同改组国民党。不过，直至他1925年3月去世时，国民党不仅没有能北伐统一中国，连广东省都没能统一。

1925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了国民政府，把广东的几派军队如黄埔军、粤军、湘军、滇军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其中力量最强的是蒋介石为军长的第一军，干部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武器由苏联供给。



黄埔军校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员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图为油画《1924·黄埔军校》（潘嘉俊 画 中国美术馆藏）。

苏联当时积极支持中国的大革命，不过更看好国民党，而不是中国共产党。苏联驻国民政府的最高顾问鲍罗廷认为，共产党员到国民革命军中的主要工作是做政治动员和宣传工作，发动工农支援北伐，而不是抓兵权。当时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陈独秀也没有看到抓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



最早重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建设的，是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

1924年11月，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为骨干，利用从苏联顾问那里筹来的一些钱和武器，招募士兵，建立起隶属于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共有120人。当时广东政府对军队

管辖很松散，谁有钱有枪就可以建立军队，只要服从政府就行。

铁甲车队建立后，实际归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主要跟随有“广东农王”之称的彭湃去保护农民运动。这表明，共产党的军队从建立起，就是为群众利益而战，与军阀部队有着根本区别。

周恩来根据苏俄的经验和国内实际，坚持在连以上单位都设立党代表，团以上单位都设立政治部。在行军作战时，党代表和政工人员要身先士卒。这为后来我党建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蒋介石看到共产党人在军队中开展工作后极为不满，不允许共产党在他的第一军中存在。

周恩来主张将共产党员完全从蒋介石的军队中撤出，另外建立军队，中央和共产国际方面却不同意这一方案。经过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努力，自筹经费，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于1925年11月在

第四军内部建立了一个团，由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叶挺担任团长。该团原称“第四军第三十四团”，翌年改称“第四军独立团”，在历史上被称为“叶挺独立团”。

这支在北伐开始前只有2100人的部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山鼻祖。

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出发北伐，首战即遭到北洋军阀部队6个团的进攻。独立团利用雨天发起猛冲，并以农民武装一部迂回敌后助攻，结果不但打退了



周恩来(1898—1976)，1924年11月—1925年8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敌人进攻，而且乘胜追击，击溃敌人3个团，自己仅伤亡63人。当时叶挺独立团主要是靠“三猛战术”，即猛打、猛冲、猛追，连连告捷。由于敌我火力都不强，北洋军阀部队又腐败无能，叶挺独立团靠着英勇精神和迅猛进攻，加上当地农民的支援，便能以少胜多。



叶挺（1896—1946），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

8月下旬，北伐军同军阀吴佩孚的部队进行了一场决战，即汀泗桥—贺胜桥战役。

在这次战役中，叶挺独立团在熟悉道路的农民引导下于深夜插入敌后，使敌军腹背受敌。独立团首先夺取了汀泗桥，为全军打开了通道。在贺胜桥一战中，担任前卫的叶挺独立团顶住了敌人的反扑，双方白刃相向，待后续部队赶到后，合力击溃敌军，一直追到武昌城下。

叶挺独立团在攻城战中又出现了极其悲壮的一幕。攻城前各军选择奋勇队，独立团第一营全体参加。在共产党员曹渊营长带领下，大家把钱物都交付文书转寄家中，并写下了遗书，表示愿为革命牺牲。攻城令一下，一营官兵齐呼“革命万岁！”的口号，在夜幕掩护下冲到城下，以云梯爬城。因守敌投下炸药包、手榴弹并以机枪扫射，曹渊不幸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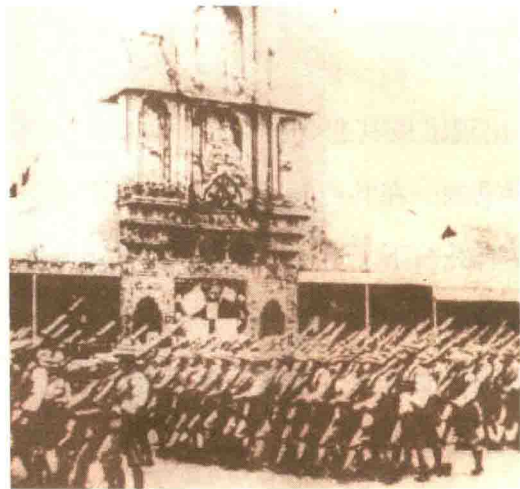
经过前仆后继的顽强进攻，北伐军于10月攻克武昌。第四军因

战功最突出而被誉为“铁军”，独立团又在军中评为首功，因此人们也习惯性地称独立团为“铁军”。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打败数量多于自己的北洋军阀部队，不仅因为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在作战中异常勇敢、不怕牺牲，使得全军士气高昂，更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有力支援密不可分。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北伐军所到之处，工农群众运动立刻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其中以湖南、湖北、江西3省表现得最为显著。在湖南，从北伐军1926年夏进入那里到第二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从40万人激增到200万人，差不多一半的湖南农民被组织了起来，发动了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在湖北，1927年1月，为抗议英国水兵在汉口登陆打死打伤中国人，共产党员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武汉各界30万人举行反英示威大会，会后冲入并占领了汉

口英租界；同月，英国水兵在九江殴打罢工工人纠察队员，数万工人和群众占领了九江英租界，后交国民革命军接管。2月，国民政府外交部同英国方面签署协定，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斗争取得了



在广州市举行的北伐誓师大会阅兵式



参加上海市总工会升旗典礼的工人纠察队

振奋人心的重大胜利。

1927年3月，当北伐军逼近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动员了80万工人罢工，并组织起几千名全副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驱逐了守城的军阀部队，使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开进了上海。

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时，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各派军队都趁机扩大自己的实力。

为壮大革命力量，当时中共湖北军委把北伐时第四军独立团留下的骨干力量集中起来，又补充了部分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和招募来的新兵，将独立团扩编为5个团，分别是二十四师的3个团和二十五师的七十三、七十五团。具体扩编情况是：团部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师部，叶挺任师长，并抽调部分军官和骨干分别组建二十四师下辖3个团。另外，以原叶挺独立团下属部队为班

底分别成立了七十三团和七十五团，后来七十三团、七十五团再加上另调来的七十四团组成第二十五师。这5个团约有8000人，后来成为南昌起义的骨干力量。

此外，独立团还抽出了一批骨干，与招募来的新兵一起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兵力约为2000人。这个团由于负责警卫武昌国民政府，被称为“国府警卫团”，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军事骨干力量。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虽然由于片面着重于民众运动，忽视对军队领导权的争取，导致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十分有限，但在血与火的战争考验中积累了建军经验，保留了革命火种。

名言金句

我们为什么能够建立这样伟大的战功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独立团是共产党的军队，因为有了共产党，我们才能成为铁军。

——叶挺

读党史 长智慧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反映了民众反帝反封建的强烈愿望，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因此，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

在这场战争中，国共两党团结合作、一致对敌，北伐军将士英勇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辉煌战果，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工人运动高潮迭起，党领导的工农组织成员数以百万计。同时，中国共产党组织得到大发展，党员数量由1926年7月间的1.6万人发展到1927年3月的5万多人，为后来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而加速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

青少年朋友，身处和平盛世的新时代，了解党史军史，牢记革命传统，不仅有助于你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

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同时也有助于你们培养敢于担当的血性豪情。在面对校园霸凌、违法犯罪等不良社会现象时，希望你们能够做个弘扬正能量的人。

九、大革命失败给革命者带来哪些沉痛教训？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1927年春天至夏天，是中国近代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毛泽东在32年后以这两句诗来概括当时的社会形势。

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受奴役的贫苦工人、农民奋起反抗，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席卷中国大地。

另一方面，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自以为羽翼丰满的国民党内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鼓动和支持下，同旧的豪绅相勾结，高悬起镇压革命力量的黑手，以所谓“清党”的名义，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

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蒋介石有军队， 我们有群众……”

国共第一次建立的合作关系在1927年破裂，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变化造成的必然结局。

国民党从成立起，就是一个松散的各派联盟，里面不少头面人物是地主豪绅的代表，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也就是改变土地制度的主张。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政策更是遭到国民党内许多反动势力的抵制。

1924年实行国共合作时，国民党控制的区域只有广州及其周围地区，连广东省都没有统一。那时的国民党要想打败北洋军阀、统一中国，需要依靠苏联援助，也离不开共产党发动的工农群众的支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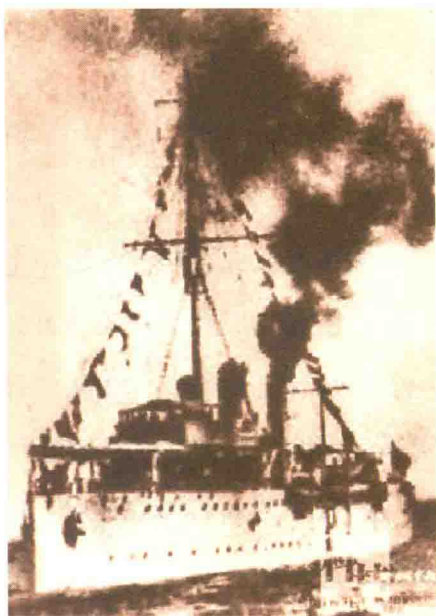
然而，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一旦发展起来，又引发了国民党内部左派与右派之间以及国共之间矛盾的激化。

1926年3月，蒋介石手下的爪牙假传命令，让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同时散布谣言说：汪精卫与共产党人图谋私调中山舰，要把蒋介石绑架到莫斯科；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随后，蒋介石背着国民党中央，以“共产党阴谋暴动”为借口，擅自宣布广州全城戒严，逮捕李之龙，扣押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并包围了苏联顾问团住处。这件事史称“中山舰事件”。

对这次事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主张坚决进行反击。但是，由于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采取退让政策，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了第一军，反对蒋介石的苏联顾问也被解聘回国。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打击共产党、篡夺军队领导权的开始。

1个多月后，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省、市以上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1/3，且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



中山舰

长等，公然改变了孙中山的联共政策。

当时，共产国际和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和步步进逼没有进行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而是片面强调维护统一战线大局，采取了妥协态度，继续主张退让。《整理党务案》又获通过。

当时，共产党内有一种说法是：“蒋介石有军队，我们有群众，到头来他还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926年7月，北伐军从广东出师，仅半年之内就胜利进军到长江流域。在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的推动下，两湖和江西等地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9月，北伐军刚占领湖南时，农民运动开始大发展，仅仅4个月的时间，全省农协会员就发展到200万人，能直接掌握的群众达1000万人，占当时全省农民总数的近一半。

工会的力量在城市里发展也很快，仅武汉总工会就掌握了30万群众，当时人称总工会主席的李立三是武汉三镇很有权威的人。他一声号召，30万人可进可退。因此，有人把武汉市工会形容为“第二政府”。

面对全国工农运动的大发展，1926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全面推动农民运动。

正是由于过高估计了看似数量庞大的工会、农会的力量，当时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没有同企图夺占军队领导权的蒋介石进行坚



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是这个讲习所实际的主办者。

决斗争，也没有注意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

历史是残酷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革命军队保护的群众运动是很容易被镇压的。

农民运动一

经共产党人出面

组织，便能够迅速兴起，主要是民众痛苦如同遍地干柴，遇到一个火星就会形成燎原之势。在封建土地制度下，农村佃户要向地主交纳的地租一般占收成的50%，再加上官府捐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在三民主义中提出了“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解决农民问题，还设想将农民交纳给地主的租子由50%减到25%。不过，国民党内当权者大都代表地主豪绅的利益，口中喊着“三民主义”，却从来不实行减租。

既然孙中山主张的阶级调和方案难以落实，共产党人开展农民运动就只能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减租问题。

湖南农民运动开展后，农民协会普遍提出了减租要求，并对土

豪劣绅进行了清算斗争。斗争方式主要是对地主恶霸抄家，还把他們押出去游街，农民自卫军的“梭镖队”掌控了农村多数地区。

毛泽东在湖南考察了农民运动后，欢呼这一运动“好得很”。与此相反，乡村土豪劣绅乃至城市中的上层人物，还有国民党主要当权者，却大骂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初心是解放被压迫、被奴役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国民党大多数当权者的“革命初心”却是维护地主豪绅和他们自己的利益。

革命初心各异，恰恰是国共合作中出现各种矛盾的根本原因所在，也决定了国共之间的合作只是暂时的，分裂终归难免。

**“我的袋子里还有草料，
它们还不会跑掉！……”**

在旧中国，有军队就有权力，枪杆子往往决定政权走向。

因此，在国共合作中，军队对工农运动的态度也影响着国共关系。

当时，参加北伐的多数部队是旧式军阀部队，人们当兵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拿一个月七八块大洋的饷钱。排、连级军官每月薪金大都有百块大洋，团以上军官就有上千块大洋。那时中国没有多少工商业，有钱人的主要投资渠道就是买地，而几十块大洋就能买一亩良田。按照当时军官的收入，当连长几年家里就能成为小地主，团以上军官可以当大地主，“军官等于地主”成为社会上的普遍认知。

所以，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难免伤害到许多国民党军官的切身利益。

共产党组织农民运动的初期，农协会员组织起来帮助北伐军运物资、抬伤员，打击矛头指向北洋军阀，国民党军官大多还算支持农民运动。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反对言论就开始在北伐军的军官中弥漫。例如，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湖南老家的老太爷就被农会游了街，何键因此对共产党和农民运动恨之入骨。

在北伐高潮中，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犯了右倾错误，关键就在于开展工农运动时，仍幻想与反共态度日渐明显的国民党新军阀妥协合作。

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掌握着对国民政府的财政援助。他曾估计，国民党军队打到北京之前是不会反共闹分裂的。所以，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他信心十足地说：“我的袋子里还有草料，它们还不会跑掉……”

实际上，西方列强和中国的买办地主豪绅当时已经给了蒋介石等新军阀更多的“草料”。

1927年3月，蒋介石率领北伐军到达上海。当时，上海一个城市的税收超过内地十几个省，控制这个城市就等于掌握了中国的钱袋子。到上海前，蒋介石已经同与英美势力有紧密联系的江浙财团代表秘密谈妥，由他们提供经费，而蒋介石方面则负责镇压共产党和工农运动。所以，蒋介石一到上海，商界马上给他筹款1000万银圆，使其财力在各派势力中占了绝对优势。

那时，旧军阀部队和旧政府官员是否效忠，关键就是看上面能不能发钱。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桂系部队，军费要由蒋介石支援，再加上他们也仇视工农运动，所以桂系的态度是联蒋反共。武汉国民政府因四面遭受封锁，财源有限，陷入经济危机，一些欠饷的军队受蒋介石收买而倒戈。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命令嫡系部队在江西镇压工会，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接着，他又利用流氓帮会捣毁了南昌、九江、安庆等地的工会。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有的同志向总书记陈独秀提醒说：“蒋介石在江西已经杀我们的同志了。”周恩来等人建议将工人纠察队集中起来，准备对付右派军队进攻。

对此，陈独秀虽有犹豫，但还是同意了。谁知共产国际却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促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隐藏起来。”

退让，只会使敌人更加有恃无恐。

4月12日，按照蒋介石的清党密令，北伐军参谋长白崇禧直接指挥了上海的反共政变。这个以狡猾著名、号称“小诸葛”的桂系军阀，先利用上海的青帮流氓冒充工人纠察队，袭击真正的工人纠察队据点；再派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一举将几千人的武装工人纠察队缴了械。次日，当上海工人游行抗议时，白崇禧又下令开枪镇压，在宝山路一次就打死了100多人，接着又全城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向警予、夏明翰等一大批著名的共产党人相继牺牲。

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1927年4月6日，天清气朗。一早起来，在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兵营内，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带着女儿李炎华去兵营空场上散步，女儿李星华坐在外间长椅上看报，李大钊在里屋伏案工作。上午11时许，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宪兵直扑苏联大使馆西院。李星华后来在回忆录里清晰记录了父亲被捕时的情景：“‘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座小屋子……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图为国民党反动派捕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情形。

1927年4月28日，由于害怕李大钊在群众中的威望和人民的力量，张作霖不敢举行公开审判，于是偷偷摸摸地导演了一出“军法会审”的丑剧。整个“会审”没超过70分钟，就仓促宣布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当日下午，李大钊等20名革命志士被秘密押解到西交民巷的看守所。

李大钊身着棉袍，在镜头前留下了最后一张照片：刚被剃去的头发、宽阔的额头、浓黑的双眉，两眼目光淡定，脸上泰然自若，宛如平日，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之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下午2时，李大钊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第一个缓步登上绞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义。

李大钊牺牲时，尚未满38岁。

一时间，神州大地乌云密布，到处血雨腥风。



英勇就义前的李大钊，神色泰然，视死如归。

“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对付武装的反革命……”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和屠杀，毛泽东心情压抑，在武汉

写下《菩萨蛮·黄鹤楼》一词：“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大意是说：烟云细雨迷迷茫茫，龟山与蛇山紧锁着长江。传说中的黄鹤飞去了哪里？眼前只有一些游客来来往往。

这是毛主席诗词中少有的苍凉、沉郁之作。1949年后注释这首词时他曾批注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正如毛泽东所说，此时党内正处于“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状态。

1927年6月3日，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份紧急电报，时称“五月指示”，要求中共同武汉国民政府一起建立新的革命军队，审判反动军官。

中共中央开会讨论后认为：莫斯科的这个指示完全脱离中国实际。武汉国民政府掌握实权的所谓“左派”已经向右转，怎么可能审判和清除反动军官呢？当时共产国际代表还把指示拿给汪精卫，结果成了汪精卫煽动下属军官同共产党分裂的工具。

此时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大多不满陈独秀的领导，其实也是对共产国际错误指示的一种间接抵制。中国共产党人对本国革命道路的独立自主探索也由此萌发。

6月末，从湖南传来消息，全省已在进行反共屠杀，武汉的湘系军阀也准备动手。

周恩来领导建立的中央特科得到了反动军阀准备对共产党下手的情报，于是安排过去公开活动的党的领导人紧急隐蔽。

在这种紧张形势下，陈独秀于7月11日宣布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后，躲进汉口一个秘密寓所不再管事。不论有什么客观原因，这种做法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好在共产党内的多数领导人还是毫不畏惧，坚持革命。

不久，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成立了5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的中央前敌委员会，准备组织武装起义。

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分共”会议，已与他决裂的宋庆龄拒绝出席会议，派人向与会代表转达了她的立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但是，汪精卫等人此时“分共”决心已定。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的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史称“七一五事变”。

在中国历史上，以1927年7月15日这一天为分界线，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之所以称为“失败”，是因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并没有达成，只是以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代替了北洋军阀的统治而已。

1927年春夏两季国民党的反共“清党”，使国民党彻底变质。据统计，国民党员“清党”前为38万人，“清党”后只剩20余万人。从这一数字也可看出，国民党不仅屠杀了大量共产党人，也杀害了很多自己党内的革命左派和思想进步者。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曾感叹说：“清党，清党，许多罪恶，借之而生。土豪劣绅，弹冠相庆，攘臂大呼：清党。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

从此，国民党彻底堕落为国内反动势力的代表。

国民党的反共“清党”更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重大损失。据中共六大所做的不完全统计，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共达31万人之多，其中包括共产党员2.6万多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5.7万人下降到不足1万人。工会、农会也被查禁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潮，悲观情绪不断蔓延。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当共产党人郭亮的头颅被悬挂在长沙城门口示众时，鲁迅奋笔写道：“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吗？”

当李大钊从容走向敌人的绞刑架时，人们不禁想起他在一篇散文中所写的：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面对困难挫折，难免有犹豫者、退缩者甚至变节者，但更多的

共产党人为追求革命真理而无惧牺牲。这种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如同红花的种子，播撒在了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

面对惨痛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人领悟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对付武装的反革命”，由此走上了探索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

名言金句

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痛苦经验中学习。

——恩格斯

读党史 长智慧

国共合作的决策是正确的，唤醒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觉悟，但因革命力量的弱小和指导上的错误，加上帝国主义支持的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了。

失败的代价是惨痛的，失败的教训却是珍贵的。

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开始懂得妥协退让换不来真正的革命友谊和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开始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掌握革命武装，不组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开始懂得只有实现“耕者有其田”，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充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扩大革命的力量……

面对大革命的失败，意志坚定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屈服。他们擦干鲜血与泪水，掩埋好牺牲的战友的尸体，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当革命力量还没有取得优势时，失败是难以避免的，关键是如何对待失败。正如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所说：“当失败不可避免时，

失败也是伟大的。”

青少年朋友，你们在成长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困惑、困苦，要勇敢面对，从检视弱点不足中发现自己的特长、优势，从迷茫叛逆中挣脱出来，进而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理想追求。

这，才是你们面对错误与挫折的正确态度。



献礼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学好党史，才能传承红色基因。写给青少年，就是写给未来。建党百年前夕隆重推出的《写给青少年的党史》丛书，立意高远，特色鲜明，是党史普及教育的成功尝试。

——中国史学会会长、《求是》杂志社原社长 李 捷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精选新时代青少年关注的60个重点、难点、热点、疑点、亮点问题，以鲜活语言、创新方式叙事明理，开辟出向青少年进行党史教育的新路径。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张启华

临近建党百年大庆，推出的这套以青少年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党史读本，选题重大，受众面广，解疑释惑，导向正确。该丛书是党史大众化、通俗化不可多得的力作，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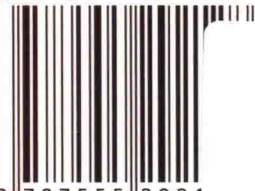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黄修荣

该丛书主题鲜明，构思新颖，设计了60个对青少年来说容易产生模糊认识的党史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以问答形式展开论述，每个问题单独成篇，连贯起来构成一部中共简明党史。与以往那种按章、节、目来写党史的模式相比，这无疑是一种崭新的尝试。

——解放军原总后勤部干部轮训大队教授 曲跃厚

建议上架：青少年读物

ISBN 978-7-5552-9212-8



9 787555 2921

ISBN 978-7-5552-9212-8
定价：38.00元